

森林裡的斗爭

～ 砂撈越共產組織研究 ～

田農著

香港東西文化事業公司出版

森林裡的斗爭

砂朥越共產組織研究

田農著

香港東西文化事業公司出版

目錄

序

拿督阿瑪楊國斯

第一章：殘餘的部隊	3
第二章：砂勝越共產黨組織	8
第三章：學運與工運	15
第四章：砂共與農民	19
第五章：發動武裝鬥爭	25
第六章：公開政黨的統戰工作	36
第七章：新邨的移殖	48
第八章：民族工作	54
第九章：砂共組織的領導層	61
第十章：砂共的軍事組織	69
第十一章：一支部隊的消失	74
第十二章：砂共與華人社會	78
第十三章：斯里阿曼行動的結局	85
第十四章：民主浪潮衝激下 共產主義世界的變革	93
附錄：公開聲明及文件彙編	105
後記	121

序

砂拉越共產組織很值得學者們加以研究，這是因為它曾經對砂拉越的政治與經濟有過一定的影響，盡管這些是負面而具破壞性的。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它畢竟是砂拉越歷史的部份。歷史是反映事實，也是社會事實的紀錄。問題是我們，尤其是未曾經歷這歷史過程，與未能親身體驗及體會的後人，如何從正確的立場，看待甚至興趣研究這歸屬於砂拉越部份歷史的問題。

田農先生是砂拉越的一位社會學者，治學研究態度嚴謹，正因此他的「砂拉越共產組織研究」，值得重視。這本書的出版，可予人對砂拉越共產黨的最初萌芽，發展，及至最終歸於崩潰瓦解，有個基本的認識。作這方面的研究工作與論著，田農先生或許是大馬的第一個人。這書的出版，將作為其他本國與外國社會學者對同樣課題，進一步研究的基礎。

其實作為思想意識與形態，砂拉越共產組織的生存發展與消失，既是本土的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部份。它有相當的獨立性，但也和國際政治的氣候，尤其民族主義結合共產主義運動所促成的國際形勢，有密切的關係與影響。

砂拉越 共產組織的萌芽，事實上是與馬來西亞共產黨有一定的關係，但後來它的發展屬於本土化，最終它的最高領導人又與外國發生連繫。表面視之，其中牽連關係微妙，其實不足為奇。倘若結合目前整個東歐共產國家的劇烈甚至全面徹底的演變，作為一脈相承的意識形態，猶如骨牌互相沖擊，無可避免相繼崩潰。

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導致馬克思、恩格斯主義，以及首次世界大戰及馬列主義對東歐與亞洲的風起雲湧影響，確曾使激進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者，對這意識形態的急速發展，抱着極大的期望與信心。但事實證明這信條，已無法實現人民的長期生活願望，再也無法適應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終於導致質變的事實，証明在今日的社會發展條件下，此種意識形態已經過時。歷史已証明它畢竟是烏托邦。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它給貧窮的階級帶來希望，但也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最終却令人絕望。因為它已成為人們求取更美好生活的社會發展的絆腳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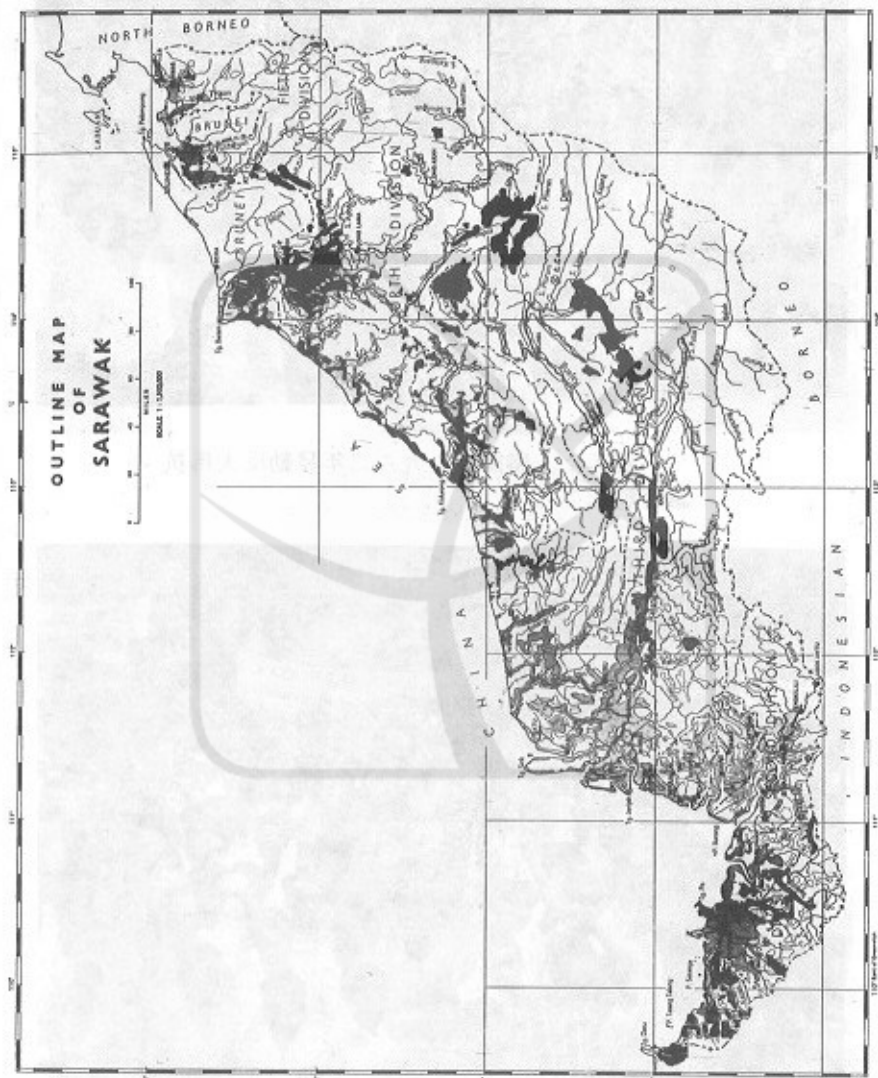
六十年代，砂拉越共產組織曾對砂拉越的保安，社會安寧，農村經濟，造成極大的困擾。換言之，這些困擾給砂拉越社會的各個層面，帶來破壞性的影響。這就是為什麼至七十年代初，砂拉越聯合政府成立，即重視遏制這影響，與設法解決這方面的問題。一九七三年「斯里阿曼行動」的成功，結果導致絕大多數的砂共組織成員放下武器，接受政府的協助而重返社會。這是頗值得欣慰的，也可說是深具遠見的舉措。

歷史既是一面鏡子，它應該令人獲取正面與反面的教育，並進而珍惜民主社會的可貴。否則，重複過去歷史，只能給人類帶來悲哀！

馬來西亞科學工藝暨環境部長
前砂拉越州第一二省行動理事會主任
兼復原委員會主席
(拿督阿瑪楊國斯)

楊國斯

28.9.90





圖示：人聯黨於一九六二年發動反大馬抗議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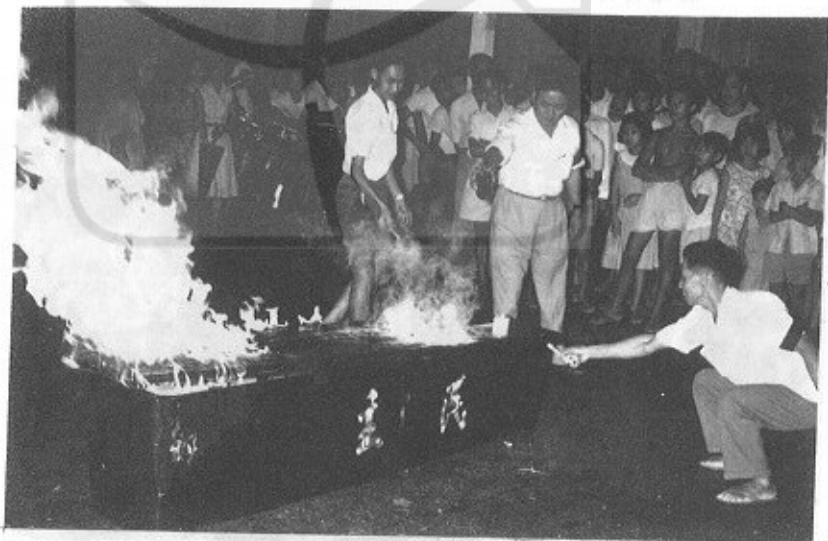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三年，聯合國民意調查團抵晉時，
沿途反大馬羣衆與警方對峙情景。





圖示：人聯黨在古晉總部舉行羣衆大會抗議英殖民地政府頒佈實施「限制居留法令」。



燃燒紙棺，以示抗議民主死亡，反對「限制居留法令」。



上下圖示：政治拘留犯在監牢中集體絕食，家屬向人聯黨領袖請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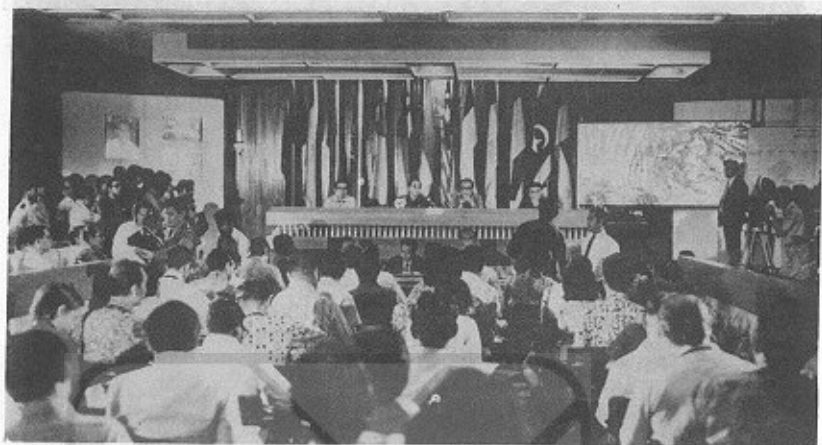
一九七三年十月廿一日在成邦江斯里阿曼館舉行諒解備忘錄簽字儀式，由首長拿督巴丁宜哈志阿都拉曼耶谷與北加里曼丹人民軍主任兼政委黃紀作先生同時簽字。



上圖爲首長拿督巴丁宜哈志阿都拉曼耶谷（左）跟黃紀作先生在簽字後，互相握手。



這兩張照片充份顯示成千上萬各行業人民歡呼斯里阿曼行動的成就。我們需要和平，所以我們一定要致力於重建和平。



一九七四年三月四日在古晉敦阿都拉昔發展館舉行記者招待會，由包括來自海外的一百多位記者參加。



首長兼州行動主任拿督巴丁宜哈志阿都拉 曼耶谷於一九七四年三月四日在古晉敦阿都拉 昔發展館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在斯里阿曼行動成就宣言書上簽署。他左邊為聯邦內政部長 丹斯里加沙里及聯邦砂朥越事務部長丹斯里拿 督朱加，他右邊為副首長拿督楊國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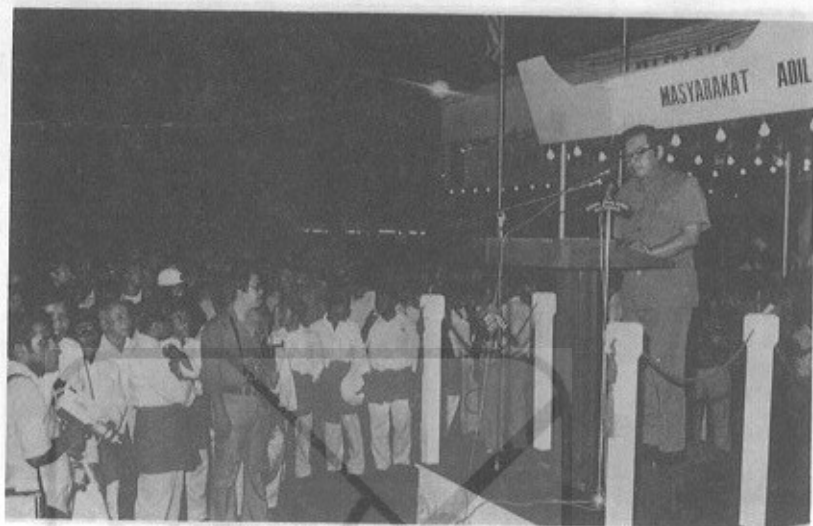


在古晉舉行的斯里阿曼遊行。



廿月十年三子武一。隨平博之五第為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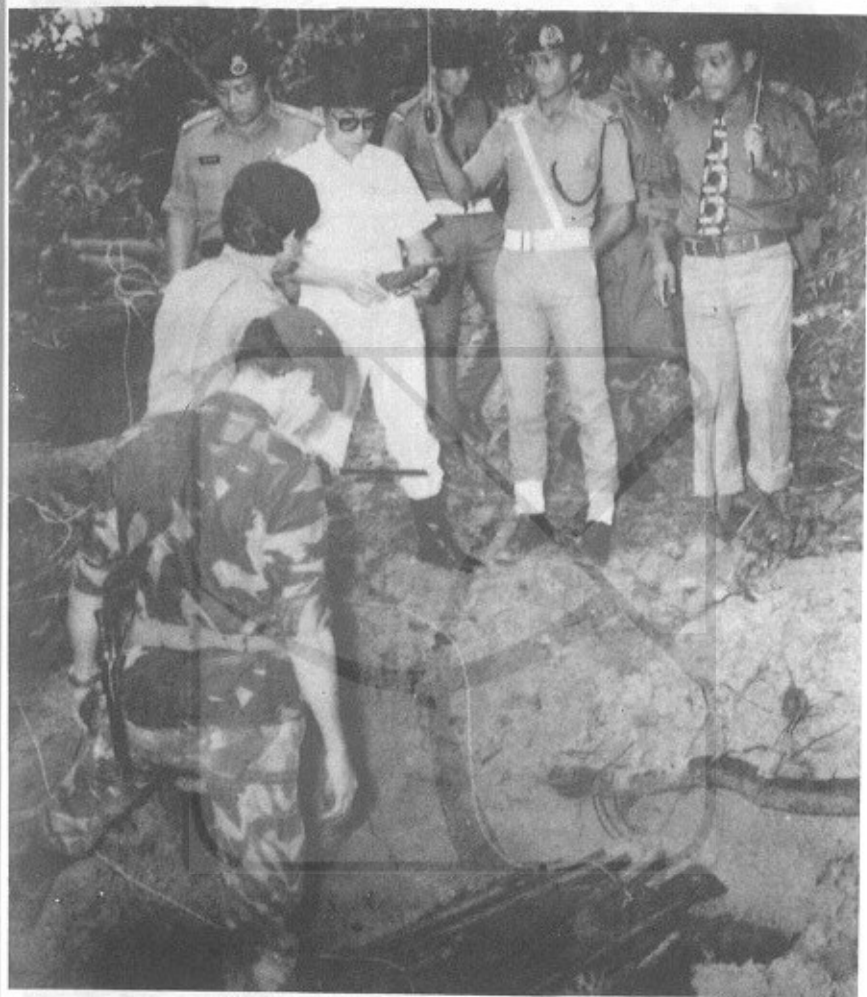
在成邦江舉行的斯里阿曼集會鏡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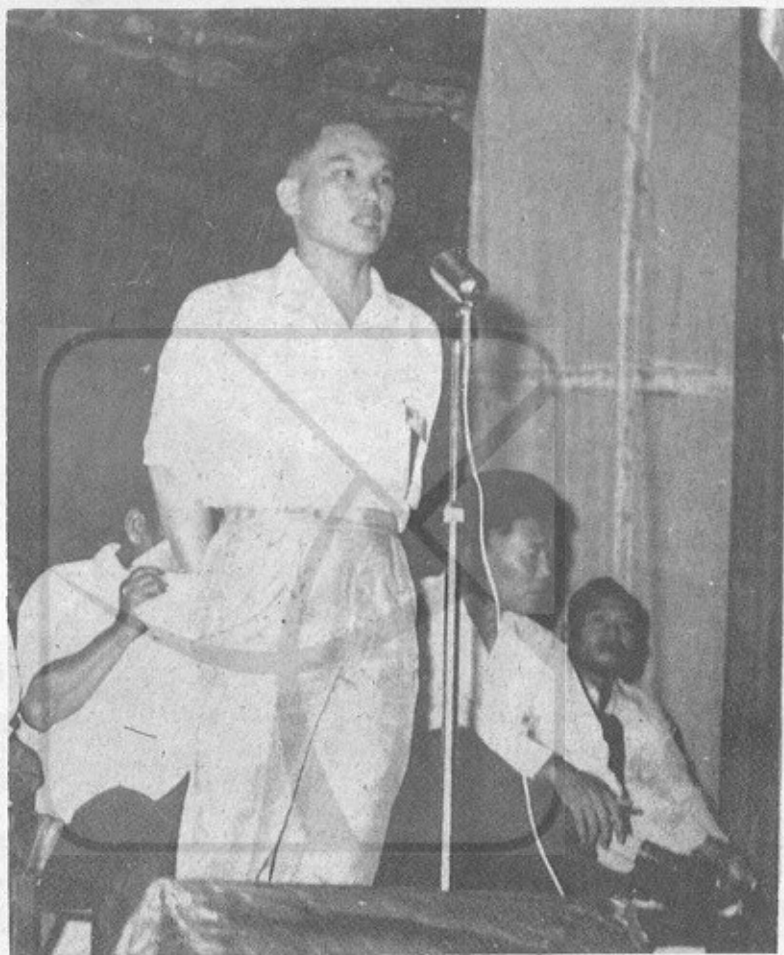
副首長拿督楊國斯在詩巫斯里阿曼羣衆集會上演說。



圖為成邦江之和平館。一九七三年十月廿一日，諒解備忘錄在此館簽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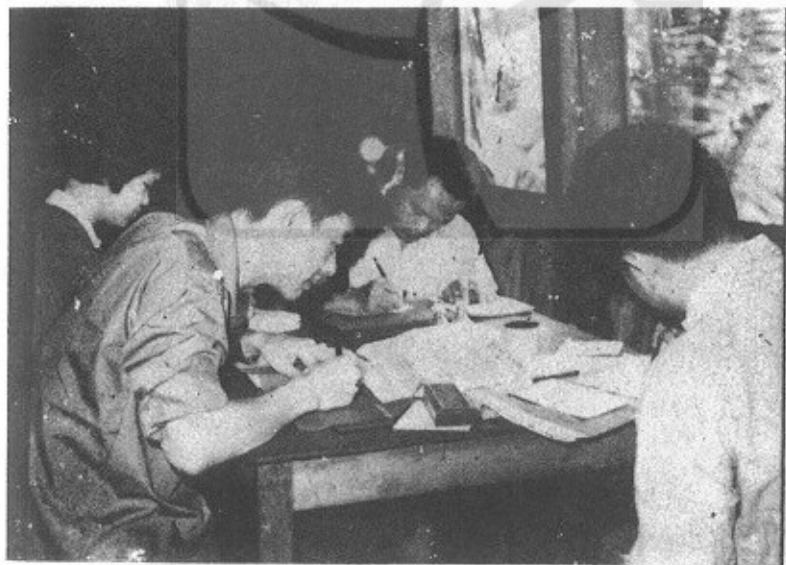
拿督巴丁宜阿都拉曼耶谷在古晉舉行的武器銷燬儀式中，檢視共產游擊隊之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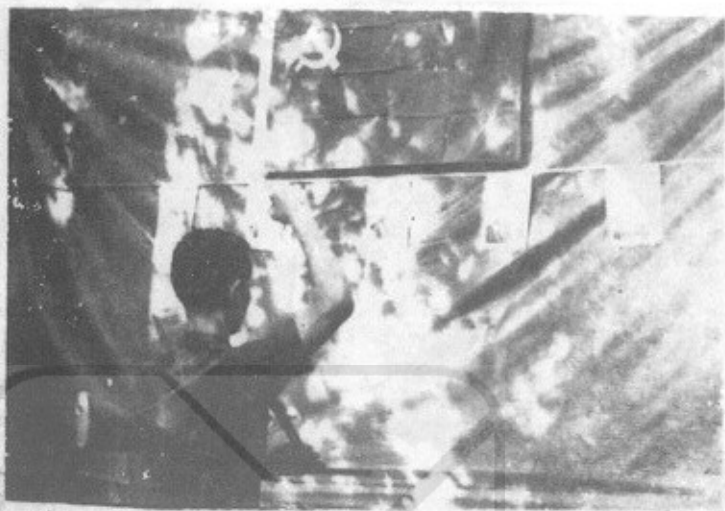
六十年代初期，文銘權在公開場合演講的神情。一九六五年，他成為砂共主席。



北加里曼丹共產黨（砂共）成立。



砂共黨員在森林營中抄寫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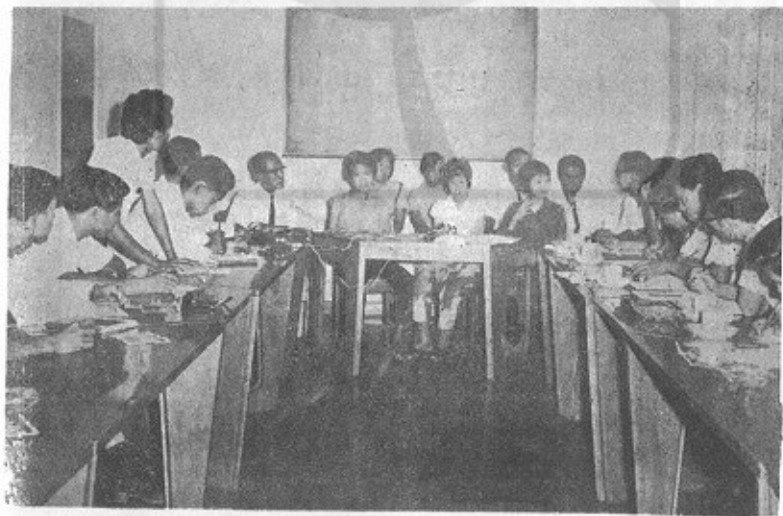
砂共黨員入黨宣誓。



砂共高級幹部，在森林中留影。



圖示：三名砂拉越人民游擊女隊員於一九六九年一月廿七日在印尼境內被印尼軍俘獲，被遣返砂拉越。



三名女游擊隊員由印尼遣返古晉後，於一九六九年三月廿一日假古晉新聞處舉行記者招待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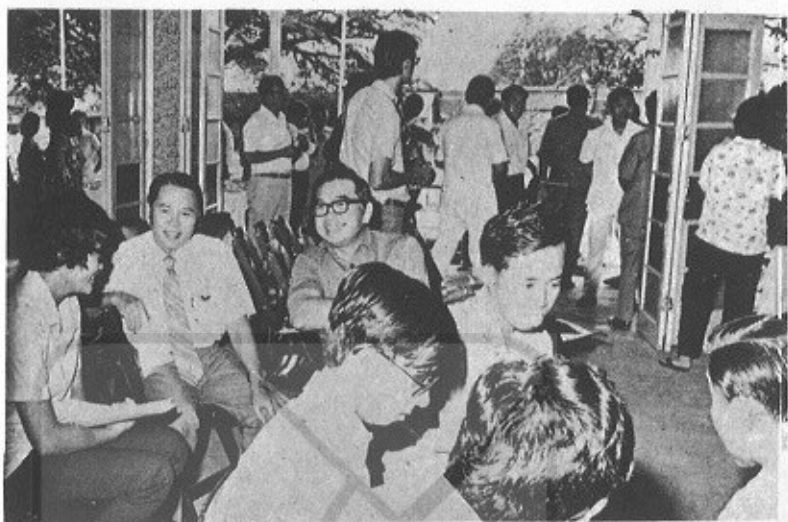
一九七四年，洪楚庭在同政府簽署「君子協定」後，基於同政府達致圓滿協議而發出會心的微笑。



在斯里阿曼行動期間，洪楚庭親身帶領第二批屬下人員放下武器重返社會。



斯里阿曼行動期間洪楚庭單獨同前拉讓保安區政治部主任袁悅凌進行傾心密談。



斯里阿曼人士於一九七五年二月初在詩巫的一個回家儀式上與政府官員談笑風生。在場的貴賓有州農業與社會發展部長黃順勝醫生，拿督楊國斯，國會議員黃和順及第六省省長詹廷明等。



在洪楚庭等與政府簽署「君子協定」的精神感召下，前砂共拉讓江上下游領導人員文對和黃理生親身動手進行毀槍的歷史性鏡頭。

張華學友：

你們好。

关于斯里阿曼行動，前此時候，由于種種原因，致使到你們
產生許多疑慮和懷疑起政府當局的心。現在你們的態度怎
樣了呢？希望你們和其他的朋友們都能早日作出明智的決定，去
來參加和談。曾經說過的是，阿里和威先生已向我們再三說過，今
天他又一次強調，比斯里阿曼行動已經晚了很久，是不能再拖延下
去了。阿里和威先生也今天同我，莫地那和黃漢的談話中說也如
果你們不能在本月二十日以前來和談，那麼政府的軍事行動
將在下月一日後臨臨開。他將會給你們最後的時間和機會，你
們还可以在馬尼拉山一帶地區（見面）作最後的考慮，時間不得超
過下月四日。除了此地區外，其他的地區，如果你們去的話，
就可能已對政府的軍事行動了。而到了下月四日以後，如果你們再
不來，則全部的地區都可能有軍事行動了。因此必須告訴你們，如
果你們再不利用這個機會來，那麼一切後果我們是不能負責
的。阿里和威先生也強調指出，他們那方面，也將不負責任。所以你們
和其他的朋友們應明智選擇，遲早或錯過此機會，將後悔莫及

（1）



林嚴平

1974年6月12日

這一張照片是林和貴又名林嚴華
簡名 M.C. 與政治部官員在古晉會
晤時所拍的。

第一章 殘餘的部隊

從遙遠而湍急的畢拉加上游，拉讓江的流水奔騰而下，經過加帛、加拿逸，然後逐漸緩慢地流經詩巫、民那丹和泗里奎，匯入南中國海，江水灌溉了兩岸的農田，為兩岸的人民帶來實惠。兩岸茂密的叢林，是砂勝越的重要資源，木材為砂勝越帶來了可觀的外匯，給政府與人民帶來了經濟的利益。

或許，我們可以追憶一下，倘若不是黃乃裳在本世紀初，帶來了一千多人的中國福州籍同鄉，開墾拉讓江兩岸的土地，那麼拉讓江畔將仍是原始的森林，為達雅克人出沒之地。黃乃裳帶領他的族人，首先在詩巫（砂勝越第三省）開墾，然後再移向拉讓江下游的民那丹與泗里奎，以及上游的加拿逸一帶，這裡都留下福州人開荒闢地的足跡。當然，我們也不能忽略更早既已到來經營土產生意的閩南人，以及稍後由鄧叔弼帶領來的廣東人，他們一樣在這片土地上流下血汗，與毒蛇猛獸搏鬥，為後人鋪下生存的道路。事實上，如果沒有大批從中國南來的華人勞工，參與砂勝越墾荒，砂勝越今日的社會面貌，是很難想像的。

就在這拉讓江兩岸崇山峻嶺的原始密林中，曾是砂勝越

共產游擊隊出沒之地，在游擊隊最強盛時期，這裡曾有千名左右的武裝份子。馬來西亞政府耗費了大量的軍費，圍剿武裝份子，彼此都疲於奔命。

曾幾何時，砂勝越共產勢力從七十年代初的強盛期，突然一落千丈，一九七四年中，有超過六百名的武裝份子集體向政府投誠，放下武器，走出森林，回返公開社會，這在共產主義的武裝鬥爭中是史無前例的，因此曾有過外國評論家，認為砂勝越這些武裝份子是烏合之衆，並不是進行共產主義的戰爭。

現在殘存在森林裡的武裝份子只剩一百多人。有一百人以上在泗里奎與民那丹一帶的森林中活動，另有二十多名在第一省石角的鄉區內流竄。他們的士氣低落，缺乏糧食和武器，對於馬來西亞政府的威脅性不大。

在拉讓江下游一帶的共黨領袖是洪楚廷，政府曾懸賞巨額賞金，逮捕或槍殺洪君，但洪楚廷至今仍活躍於森林中。事實上，洪氏曾於一九七四年走出森林與政府談判，但因為談判不攏，仍走回森林帶領其殘餘部隊。

洪是砂勝越共產地下組織的高級領袖，他是該組織的七個中委之一。七個人當中，五個已投誠，一個在北京。洪楚廷早年在古晉中華中學受教育，稍後轉赴詩巫受高中教育。小時從中國潮州的鄉下隨父南來，他是懂得刻苦的人，待人看來似乎還和藹，但也免不了地下份子的陰冷。

殘留在森林中的武裝份子，教育程度都不高，比較起來

洪楚廷的知識遠勝於部下，加以他的組織與領導才能，頗能博得下屬的信服，即使現在處於極為艱苦的日子，他們仍然不接受政府的呼籲而投誠，似乎有意從事長期的鬥爭。洪楚廷的妻子多年前被政府軍槍殺，留下的女兒已十多歲。他的女兒及已經衰老的父母親，曾一再呼籲洪君走出森林，回家過正常的生活，但洪却似乎在為其理想而鬥爭。

「砂勝越共產黨」在一九五二年時已具雛形，那時的左翼份子受中國解放運動的激盪，開始在境內進行活動，諸如領導中學生罷課，在鄉村搞農民運動。然而，這時期的領導人仍是具有僑民意識者，他們嚮往於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因此在五十年代時有大批受過中等教育的華籍青年，返回中國。於是地下組織的領導人開始換班，文銘權與黃紀作就在這時期崛起，成為該組織的領袖。

文銘權在一九六二年時，曾受當時的英殖民地政府拘捕，在限制居留令下被限居在一個小市鎮，稍後也就是在同年自動返回中國，現在仍居於中國，我們可以在稍後時再作細述。

黃紀作與文銘權一樣，早年在古晉中華中學受高中教育，學生時代已是一個活躍份子。離校後他參與「人民聯合黨」（現在國民陣綫成員黨，也就是執政黨）的工作。一九六二年與文銘權一樣，在限制居留令下被拘捕，也同時與文一起返回中國。但黃紀作在一九六三年從中國潛返砂勝越，到印尼邊境一帶從事武裝鬥爭，領導他的部隊。

黃是一個開朗的人，沙啞的聲調在談話時頗具說服力。在地下組織內，黃似乎頗受其部隊信服。然而出生入死的他，不料在一九七四年中，與砂勝越首席部長達成協議，與林和貴共同率領其近六百名的部下，放下武器，向政府投誠，這種戲劇性的發展，導致「砂共」的勢力頓時一落千丈。

黃紀作與其部下的投誠，文銘權曾在北京的廣播聲明中給予譴責，並強調：「無產階級的導師毛澤東，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暴力革命的學說，就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並且聲明：「我們將繼續以武裝鬥爭作為主要的鬥爭形式，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堅持和發展游擊戰爭。」

黃紀作在稍後時公開指出，文銘權的談話不着邊際，躲在北京說夢話。

事實上，砂勝越共產組織勢力的衰落，可以說種因於內部的權力鬥爭，以及外部的強大壓力。領導者大抵是受過中等教育，小康之家出身的青年，他們只是為一個夢中的理想而鬥爭。因此，當壓力一來，面臨生死存亡，或為私人利益作抉擇的時候，便不顧一切，甚或於幹出嚴重的出賣組織的事件，這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

游擊隊在森林裡鬥爭了十幾年，他們很難取得山地民族（主要是達雅克族）的合作，似乎只有幾個山地民族參與他們的隊伍。這一點，對於從事長期游擊戰的武裝份子，是一個致命傷。

砂勝越共產組織的勢力已大為衰退，在森林裡的鬥爭面對兵源不足，補給困難，加以政府軍的壓力，洪楚廷能突破困境嗎？文銘權只在北京發號司令，能有作用嗎？這倒是令人興趣的。



第二章 砂勝越共產黨的組織

砂勝越的共產黨組織與中國共產黨人有深切的關係。三十年代時期，中國大陸外內交困，知識份子肩負着時代的使命，挽救中國的命運。這些知識份子群中，有些南下星馬、印尼與婆羅洲，他們當中有的抵達了荒僻的砂勝越，在這裡開辦了華校，宣揚他們的思想。

一九四一年以後，砂州已有共黨小組存在。他們主要的活動範圍是華文學校。戰後初期，在古晉出版的一家華文日報「中華公報」，被認為是一家早期宣揚左翼思想的報章，這家報章的出版人與編輯乃來自中國，稍後他們被遣返中國，報紙也於一九五一年初停止出版。

中國的長期內戰到一九四九年時已到決定性階段，共產黨奪取政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對海外左翼運動是一個很大的激勵。特別是星馬婆一帶，左翼運動以華人為核心，他們在文化領域與政治領域內展開了對當時英殖民地主義者的鬥爭，馬共的潛入森林進行游擊戰，更為舉世矚目。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〇年間，「學習小組」（即初步灌輸共產主義的機構）第一次在古晉成立。這些小組最初所研

究的資料，主要是中國國家主義，其次才是共產主義。這時期的左翼份子，仍視自身為僑民，他們更為關心中國的政局，因此，不少知識青年返回中國大陸。一九五一年期間，他們企圖把許多孤立的小組聯繫起來，並指導他們認真學習共產主義理論。同年，一名砂勝越華人青年奉命到星加坡，與馬來亞共產黨建立聯繫，尋求馬共的指導來砂勝越建立共黨組織。這名華人青年，名叫張榮任，曾在古晉受中等中英文教育，六十年代時期，似乎還在印尼一帶活動，但許久來已不知去向。

一九五四年三月，張榮任曾秘密經由印尼國境潛返古晉，去聯合於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四年初期間存在的四個獨立的共黨小組，並建立了「砂勝越解放同盟」。該同盟接受在星加坡由共黨控制之「反英同盟」的指示與資助。

一九五四年九月，「砂勝越解放同盟」成為了一個凝集的單位，有大約三十名會員與一百名同情者。它開始向華校學生介紹共產主義，並計劃擴展其活動至工人與農民方面。這些活動主要集中於砂勝越第一省的古晉與第三省的詩巫。

一九五四年末或一九五五年初，「砂勝越先進青年協會」成立，成為「砂勝越解放同盟」的衛星組織，其目的在於影响州內各地各階層的華人。

一九五六年「砂勝越先進青年協會」組織了領導勞工、農民、政界、民族工作、宣傳與出版工作，以及學生運動。而學生運動乃是砂共組織所控制下各集團中資格最老的，砂

共曾在古晉領導了多次的學生示威罷課，包括一九五一年及一九五五年，這類學生運動，訓練了許多共黨幹部，並且有些成為砂共的重要領導人。

砂勝越政府曾於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杪在古晉鹵獲的文件中，指示學生運動各種不同的任務：

「在革命運動初期，學生運動常起着先鋒和橋樑的作用……不過整個社會運動發展到一定的歷史階段而處於非常低潮，工農階級暫時不能起領導作用時，學生運動可能再度突破社運沉靜的局面而起先鋒領導作用……最終在被工農階級取代之……」。

當局於一九六五年三月在詩巫的武吉阿錫鹵獲一項文件中，列出了「學生運動的目標和作用」的大綱：

「學生運動是要配合以後的武裝鬥爭，以打擊牽制和分散敵人的力量……這就是以『革命兩手，反對反革命兩手』的鬥爭策略……學生運動在白區地域的鬥爭，也即是深入敵人心臟區的鬥爭……」。

這份文件同時指出學生運動是參加革命運動的力量之一，並指出其活動應與工農運動互相配合。

隨着時局的變動，砂共會採取相應的政策，但對學生運動則仍是異常的重視，因為砂共組織極需依賴學生來供應有智慧和理想主義的幹部。七十年代初，砂共面對政府軍圍剿與補給的諸多困難，因而更需要學生力量的支持。這可由砂共組織於一九七〇年初對其全面革命計劃作政策性的檢討時

給予學生運動的重要指示來證明：

第一：從搞學運着手，培養幹部逐漸擴展到社會運動（工運和農運）方面去，從而推動我國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

第二：突破公開工作一環，帶動全國政治形勢的發展……壯大和鞏固革命組織的力量……；

第三：以地下工作為主，以民族工作為中心任務，放手發動群眾，積極準備和適當展開武裝鬥爭。

砂共組織採取慣常的手法，開始向年紀尚輕的灌輸共產主義思想，隨着他們年歲增長，在連續不斷的淘汰之下，確保只有最適合的學生，能夠把個人及家庭的利益置之度外，完全為共產主義而奮鬥者，才被選擇。

一九七一年初砂共發出一項指示：

隨着形勢發展的需要，組織上規定了我們學運的工作在今年來所要達到的指標：團結五十到七十巴仙的學生群眾，吸收二十到三十巴仙的學生參加學生運動，財政工作的目標是三萬五千元；培養五十名砂勝越先進青年會的成員，吸收一百五十名成為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同盟的成員……。

從四十年代開始，知識青年即是砂共主要的爭取對象。知識青年往往是理想主義者，他們對現狀不滿，特別是在英國殖民主義者統治砂勝越時期，他們欲為理想而鬥爭，結果往往墮入圈套，至到後來認為一切都破滅時，則發表自白書，認為自己受誤導，而這些自認為受誤導者往往是重要的領導幹部，這在砂勝越是司空見慣的。

砂勝越共產黨的組織目的，乃欲建立一個共產黨統治的砂州，隨後則包括沙巴州與汶萊（即砂沙汶三邦）。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以前，砂共似無武裝鬥爭的準備，共產黨組織乃欲通過控制公開陣綫，奪取政權。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砂勝越鄰邦汶萊發生了一場由人民黨黨魁阿查哈里所領導的流產政變。這場政變間接導致砂共改變政策，即決定以武裝鬥爭作為基本的與必須的革命手段。其時，砂共組織仍極缺乏軍事知識與軍事配備。他們於是決定進入印尼邊境，與印尼共產黨取得聯繫，在印尼接受軍事訓練。砂州政府在一九六四年九月間所鹵獲的共黨文件，「我們的時代」中，即這麼說：「所謂和平鬥爭寄望於議會，又是一種策略……惟有武裝革命鬥爭，才是有效的鬥爭形式……」，這顯示了砂共在鬥爭形式方面的改變。

一般上，我們所稱的砂共組織，除了「砂勝越先進青年會」之外，尚包括兩個共產黨衛星組織。這兩個組織是「砂勝越農民協會」與「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同盟」，前者對砂共在人力與財力方面，有很大的幫助；後者則是供作砂沙汶三邦共黨統一戰綫的後盾。

砂勝越共產黨的結構乃是依據民主集中制——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團體，支部服從中央領導。

它的組織系統如下：

(1)三個人以上可以組成一個細胞組織。

(2)數個細胞組織組成一個支部。

(3)數個支部組織縣委會。

(4)數個縣委會組成市委會。

(5)數個市委會組成省委會。

(6)數個省委會組成中央委員會。

(7)所有的委員會組織設有主席，副主席，書記，宣傳主任與財政，並視組織人數多寡而有所增減。

上面提及，早期的砂共組織是泛指數個共黨秘密組織，因此砂共領導人很早就有計劃組成一個共產黨中央。其實，遠在一九六五年當砂共領導人與印尼共產黨代表在印尼屬加里曼丹坤甸秘密會議時，已經提議建立一個統一的共產黨組織。然而，由於多種因素使得這個計劃要在數年後才能實現。其時，由於印尼終止對抗馬來西亞，砂共開始面對不安定的局勢。其次在砂共組織中央領導層內已因政策問題而發生權力鬥爭，林和貴（林嚴華）與葉存厚之間的分歧深刻影响組織與部隊之間的關係。這使得砂共要延至數年後方有統一的組織。

一九六九年，砂共組織決定在砂勝越加速進行武裝活動，在其發出的重要政策指示中，是要將組織改爲一個共產黨，爲整個北加里曼丹的共產革命提供鼓舞和領導。這裡作一摘要引述：

「無產階級政黨的建立，首先必須從思想上和政治上進行，其次才是在組織上進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黨的唯一的世界觀和理論基礎，也是黨的團結與統

一的基礎。由此可見，爲着建立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黨，我們現時刻不容緩的具體任務是：

(a)大量出版和發行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努力宣傳與學習毛澤東思想……這是使黨的建立有堅固統一的思想基礎的保證。

(b)必須廣泛地深入地和反覆地宣傳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爲指導進行觀察、分析、研究而得出來關於北加革命的一系列根本或基本的問題，以便使黨建立在統一的無產階級的鬥爭綱領和鬥爭路線的基礎上。這是保證黨在政治上能夠強大有力的一个基本因素。

(c)掃除目前存在着的妨碍黨的建立的各種思想障礙，即同一切錯誤思想作堅決的鬥爭……惟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的建黨工作得以比較順利的進行和建立後的純潔性……。」

一九七〇年三月三十日北加里曼丹共產黨於是便宣告成立。在它的宣言中，北加里曼丹共產黨對其工作方針和它對馬共有如兄弟般密切的關係作了聲明，以暴力鬥爭實現其共黨統治的目標。聲明同時指出，北加共產黨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鼓舞，以追求政治權力。

北加里曼丹共產黨的成立，仍以遠居北京的文銘權爲黨魁，而林和貴與黃紀作却是實際的領導人。一九七四年的斯里阿曼行動，林與黃皆已接受政府的條件，宣佈率領其六百名左右的部屬放棄武裝鬥爭，走出森林，與政府合作。這個戲劇性的變化已導致北加共產組織的瓦解。

第三章 滲透職工運動

砂勝越共產黨通過華校吸收幹部黨員，黨的主要領導人多來自受華文教育者，這與馬來亞共產黨（包括新加坡）的組織背景很為相近。因此重視學運自是必然。

然而，工農群眾畢竟是佔砂勝越人口的多數，特別是農民階層。砂共一向奉行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爲了推行共產主義，他們積極的向工農大眾貫輸共產主義思想。從五十年代開始，便有計劃的進行組織工農群眾。

工人群眾通過組織工會來爭取自身的權益，這原是合法之舉。不論在高度發達的工業國家抑或發展中國家，在改革社會運動中，工運都扮演著積極的角色，因此工會組織便形成了有力的一環。共產黨不惜通過各種手段，以達到它們的政治目的，砂勝越共產組織通過州內的職工運動，藉以擴大聲勢，在初期的職工運動中，砂共已積極滲透入各個工會。

一九六二年末期，在砂共發出一項政策性文件中，揭示了職工運動的三個基本任務。

(一)必須密切的團結所有的工人群眾，尤其是民族工人群眾。

(二)必須積極地進行政治思想教育，以提高工人群眾的政治思想水準，使工人群眾徹底了解歷史任務，爲反殖、反帝

、爭取祖國的獨立解放而鬥爭。

(三)必須經常關心職工群眾經濟生活狀況和勞工條件，積極地爭取改善職工群眾的物質與文化生活條件。

在一九六六年時，依據政府統計，砂勝越州內註冊的職工會共有四十七個，其中有二十七個共有五十多名會員，是在共黨控制或影響之下，這些工會的主要實力是在古晉與詩巫。

在一項被竊獲的文件中，証明了「詩巫工商僱員職工總會」於一九六一年已受共黨支配。這份文件說：「砂共組織已委任幹部在這個職工總會轄下的十個分會中担任職務並且決定了不必徵求非砂共組織成員的意見，而實行改組這個職工總會的計劃。」

共黨操縱職工運動的主要目標，就是在砂勝越建立一個「全砂職工總會」。根據砂州政府在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二日所竊獲的一份共黨地下出版物透露，共黨所揭示的目標是完全控制這個機構：

「組織的目標，在於建立一個全砂職工總會，它必須切實符合共產主義原則，預先就決定了組織控制。」

為此，共黨積極滲透職工運動，砂勝越第一省職工聯合會的成立，就是實現其最終目標的一項步驟。這個擁有二千多名會員的職工聯合會，一開始即由砂共所控制。一九六六年三月，政府宣佈「第一省職工聯合會」為非法，這對於共產黨是一項公開的挫折。

由於時局的迅速變化，一九六三年之後，砂共已將其主要的實力轉入武裝鬥爭，因之公開的職工運動不免遭到忽略，加以政府採取嚴厲行動，使共黨在控制職工運動方面遭到挫折。

一九六九年之後，砂共的武裝鬥爭面臨另一新階段。其時，由於馬印軍的聯合圍剿，武裝鬥爭的實力經由印尼婆羅洲邊境完全撤回砂勝越境內，砂共不得不重新整頓其組織，公開的職工運動亦然。雖然在砂共組織的全面政策裡，職工運動與其他方面的統一戰綫比較，顯然給予較低的優先權。這是基於兩個因素。砂勝越是以農業佔優勢的，產業工人的隊伍並不可觀，所以砂共組織要沿襲傳統的共黨路綫，即是組織一個有效的職工運動，其機會是有限的，然而，在面對新的局勢下，他們仍計劃採取新的行動，企圖把城市勞動人民組織起來，以便實現統一戰綫的基本要求，即工人與農民的聯盟。

此種計劃反映在砂共一九七〇年八月間發出一項政策文件中：

「……林彪副主席說：歷史証明，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統一戰綫必須包括兩個聯盟。第一個聯盟是工農聯盟，第二個聯盟是勞動人民同資產階級以及其他非勞動人民的聯盟。工農聯盟是工人和農民與一切城市勞動人民之間的聯盟；這是統一戰綫的基礎。工人階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是不是能夠掌握領導權，關鍵在於能不能領導農民起來鬥爭，把廣大農

民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工人階級只有取得對農民的領導權，才有可能結成第二個聯盟，才有可能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才有可能勝利地進行人民戰爭……。」

一九七〇年，中國正處於文化大革命，林彪仍處於得令的當兒，砂共的政策一向深受北京影响，因此林彪的言論仍被奉為圭臬。

由於政府的反擊，砂共在職工運動方面似乎並沒有太大的作為。七十年代之後，以前的職工領導人，幾乎都發表聲明背棄共產組織，砂共在公開職工運動方面影响力已達至衰微的地步。

第四章 砂共與農民

砂勝越共產組織重視農民運動，類乎重視學運與工運一樣。事實上，這些都不能孤立看待。受過訓練的學生運動幹部，他們可以滲進工運與農運，為共產黨在砂勝越建立蘇維埃政權而努力。砂勝越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成年人是農民，因此任何組織如欲控制砂勝越，則必須得到農民的支持。共產黨所慣用的統戰方式，是建立所謂工農聯盟，在砂勝越這樣一個落後的地方，組織「農民協會」，藉以協助共產地下組織，那是可以理解的。

一九六一年初，砂勝越第一省的農民發起籌組「農民協會」，稍後並向當時的英殖民地政府申請註冊。不久他們又計劃申請全砂勝越的「農民協會」。當時的左翼報章「新聞報」，立刻歡呼贊同這項建議，呼籲政府讓「農協」早日註冊。該報稱「農民協會是農民運動的先驅者」。此後第一省的農民此起彼應的表示意見，認為組織農協符合廣大農民的要求，當然，大部份的農民是不懂得共產組織的企圖。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的「新聞報」地方新聞發表第一省二十一哩農民對籌組農協的意見：「在這殖民主義者統治的社會裡，我們農民的生活是非常痛苦的……但我們相信全國農民的處境和命運是一樣的，要求也是一樣的，由於農

民沒有統一的力量和自己的組織，只好含冤受苦，任人欺侮。爲了照顧農民的切身利益和解決困難，目前組織農民協會是應該而且必要。……」

稍後砂州各地的農民，相繼呼籲組織全國農協。當時第三省詩巫、泗里街、民那丹及加拿逸等縣份的農民相繼發表書面聲明支持組織全國農協。從聲明裡可反映出籌組全國農協的政治目的。

「……我們稍微回想一下過去的事，每當面臨困難和不合理的事件時，心想起來擺脫，往往由於孤立無援而含憤受辱。這不能說明我們農民是軟弱可欺，天生沒有力量的，而力量不能體驗出來，這完全是分離散漫無組織所造成的，所以只要我們能勇敢地起來組織自己的農民組織——農民協會，並使廣大的農民兄弟都能不分民族和信仰緊密的團結在它的周圍，產生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那怕是比自治獨立更艱難，更宏偉的事業還是能戰勝的……」。

砂共的籌組農民協會，固然是欲藉團結農民的力量，爭取砂勝越的自治獨立，進而在農村中建立蘇維埃政權。在六十年代初期，砂共運用其統戰策略，操縱了公開的政黨「砂勝越人民聯合黨」，積極推翻殖民地政府。「農民協會」的籌組乃欲配合其有利的形勢，建立一個由「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當時的殖民地政府洞悉砂共的計謀，在一九六一年八月的立法會議上宣佈不准「農民協會」的註冊。政府指出該協會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以關懷農民福利爲藉口

而向鄉村民衆散佈共產思想。

在這之後，「砂勝越農民協會」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八日建立成爲共黨的一個地下組織。

根據共黨地下刊物「學習報」於六二年十月一日所登載的「組織農民協會決定」一文，其迫切任務是：

「這個協會的急務是提供有利情況訓練幹部，爲革命打好大眾根基，方便進行種族的工作，掩護同志以及應付農民之需，進行激烈的鬥爭。」

「砂勝越農民協會」的發展是相當觸目的。由於農民知識水平低，生活純樸，華族農民大多傾向於共產中國的生活方式，特別是中國解放後至文化大革命之前，誤以爲中國是農民階層的天堂，因此這個協會在砂勝越州各省都有堅強的分部。

五十年代與六十年代時期，砂勝越的衆多鄉村華校，在向農民作共黨宣傳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譬如，農村中長大的學生被吸收加入「砂勝越先進青年會」。他們離校後，便被派去領導「農民協會」，影響當地的居民並同時吸收新的組織成員。

事實上，早在一九五四年，共產秘密組織曾檢討它當時的地位，那時它認爲還沒有力量去煽動鄉村民衆。砂勝越政府曾搜獲那時期的一份共產文件，文件指出：

「目前，砂勝越的農民沒有受到地主的壓迫和剝削。一般來說，目前的砂勝越還沒有地主階級的存在，只有富農階

級存在，比起毛澤東一九二七年做農民運動報告時的中國，他們所受壓迫和剝削程度是相對地輕，他們的覺悟是相對地低。他們的私有財產觀念及散漫性，比較無產階級是不大有興味參加革命運動的。」

「沒有共產組織的存在，農運要走上正確的道路是不可能的。」

共產黨分子當時認為工人比較容易受利用，因為他們是沒有財產的人，在革命中不會有甚麼損失，反而可以得到利益。而認為農民思想偏狹、自私，相信命運和具有舊思想。

以六十年代前的情況而論，農民的基本生活還是不錯的。砂勝越土地面積廣闊，只要肯從事勞動，便不愁衣食。土著方面，達雅克人擁有大片的土地，但由於他們農耕法的落後，生產自然不能與華族農人相比。至到現在，情形仍然沒有多大的改變。

一九六二年杪與一九六三年初，砂共積極進行武裝鬥爭，有大批青年越境進入印尼國土，參加武裝訓練，許多農村青年參與此項森林裡的鬥爭。秘密組織的「農民協會」不僅提供了武裝鬥爭的人力，並且提供了財力與物力，廣大的砂勝越農村成為掩護武裝份子的好場所，以第一省西成公路為例，這一帶原是屬於紅色地區，大部份華族農村青年曾參與共產組織的活動，他們可能在白天仍然從事農作，但夜晚却為他們的組織而奔忙。

砂勝越政府曾經疲於應付，因此在六十年代中期，在廣

大農村中實施緊密狀態，並且在西成路設立了三個新村，即新生村、來拓村與大富村。這三個新村用重重的鐵絲網圍起來，軍警嚴加守衛。農民白天到田地勞動，晚上必須回到村裡過夜，不能自由活動。這種新村的移殖，或許是從馬來半島對付馬共的經驗中得來的，對於堵塞共產黨的武裝鬥爭，確然是有效的。至到現在三個新村仍然沒有解除，但居民已可以自由活動，或許新村的居民們，在經過多年的管制之後，已慣於這種生活。

砂共於六六年初印尼邊境潛回砂勝越境內，從事武裝鬥爭，他們主要是在森林與農村中活動。六八年時，由林和貴領導的砂勝越人民游擊隊潛回第一省海口區「怒諾」，企圖建立其革命根據地。「怒諾」是一個距離古晉不遠的海外農村。在這裡他們積極進行軍事訓練，他們在農村委員會下實行一種類似公社之制度，支持武裝鬥爭。砂勝越政府在一九七〇年之「巨網」行動中，消滅砂共的計劃，在一份獲得文件中，揭示了農村委員的目的。

「組織的任務是佔領農村；村委的任務是組織群眾。這不但是組織內的任務，也把任務交給群眾一起來完成……。」

「從每十個群眾中選出一名代表參加代表大會以便建立農村委員會。……砂勝越農民委員會的一切內部事務都屬於農村委員會所管轄。砂勝越農民協會和北加里曼丹解放同盟的地位是平等的……將來，我們會把農村委員會改為公開的紅色政權……。」

該文件接着強調農村委員對福利工作的重視，以便引誘居民給予支持。諸如(1)大力開辦學習班，以便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2)經常推行福利工作。(3)組織勞動互助組，解決群眾中碰到的困難……。

砂共曾在「怒諾」區建立短暫的紅色政權，這原因是此地區處於孤立的沿海地帶，在接近一千個家庭中，超過一半是通過農村委員會加以控制的，這是「砂勝越農民協會」所表現的成績。

砂共武裝鬥爭計劃，顯然欲效法中國共產黨，以農村包圍城市。因此，它曾積極地在農村中進行各種活動，包括恐怖活動，不聽命的農民曾在許多農村中被殺害，這也間接導致農民逐漸背棄共產組織。一九七四年的斯里阿曼行動，已導致砂共的潰敗，只剩下少許殘共在偏僻的農村中活動。

第五章 發動武裝鬥爭

在論述砂勝越共產黨如何發動武裝鬥爭之前，我們有必要追述一下歷史。一九六二年十二月，砂勝越鄰近的蕞爾之邦汶萊，發生了一場武裝叛亂，這場叛亂由汶萊人民黨領袖阿查哈里所領導。事實上，在叛亂之前，汶萊人民黨幾乎已控制了整個城邦，倘若不是操之過急，阿查哈里現在可能已坐鎮汶萊，而無須流落印尼。雖然這場叛亂為時數天即遭英軍救平，但它對砂勝越，乃至馬來西亞的影響，不可謂不深遠。

雖然，汶萊的叛亂與砂共並無直接關係，較後時，砂共領導人甚且認為汶萊人民黨的起義是操之過急，打無把握之戰。但這場叛亂却刺激而且加速了砂共的武裝鬥爭，與當時印尼的蘇加諾政權合謀，意圖粉碎馬來西亞的計劃。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汶萊叛亂，使原已呈現不安局勢的砂勝越受到極大干擾。事實上，在這之前的數個月，政府已發現與汶萊接壤的林夢省，有兩處地方曾被利用為假武器的訓練營，並且搜獲印有「北加里曼丹國民軍」標幟的深綠色制服以及一些屬於一個地下軍事組織的文件。

叛軍在凌晨時向各地發動襲擊，主要是攻擊警察署。他們的主要武器是獵槍，穿的是「北加里曼丹國民軍」的制服

。叛軍除了襲擊汶萊外，並且進入砂勝越的林夢省與美里省，在實務地的鎮上，曾發現叛軍的踪跡。叛軍也曾攻陷屬於北婆（即沙巴）領土的委士珍，並且把持該鎮達三十六小時。

叛亂發生之後不久，阿查哈里即逃亡至菲律賓，宣稱他是汶萊叛軍的領袖。顯然的，「北加里曼丹國民軍」的叛亂，目的在於以武力控制汶萊，奪取這個自治邦的政權，建立「婆羅洲合衆國」。阿查哈里較後在馬尼拉舉行記者招待會，自命為「婆羅洲合衆國」的總理兼外交和國防部長。「婆羅洲合衆國」的領土目標是包括砂勝越和沙巴，即是北婆羅洲三邦。

阿查哈里所領導的人民黨，在這之前曾公開反對馬來西亞的計劃，他的政黨主張獨立。在叛變的數個月前，人民黨在鄉村議會的選舉中獲得百分之百的成功，鄉村議會然後將選出立法議會。由於如此，人民黨的領袖與黨員在一切事務與生活中，表現驕橫的態度，這是當時一般曾到汶萊旅遊的人士敏銳感覺到的。

當叛亂開始時，叛軍似乎表現英勇，叛軍且曾揚言將爆炸詩里亞油城。阿查哈里稍後在馬尼拉招待記者時披露，他已向「北加里曼丹國民軍」發出進攻砂勝越古晉的訊號。他說：「當我的部隊進攻古晉時，英國人將會嘗到我們的真正力量」(1)。然而，英國增援部隊陸續開抵汶萊後，叛亂在一週之內即被粉碎，不久之後，阿查哈里即從馬尼拉轉往耶加

達，過其流亡生涯。

當汶萊發生叛亂時，當時印尼總統蘇加諾曾公開表示讚揚，宣稱為自由而奮鬥的汶萊人民最後將獲得勝利。他在一宴席上宣稱，「汶萊發生的事件與新出現的勢力有關，此種運動將獲得勝利。該項運動將使世界改觀，並使人民過着幸福的生活」(2)。從許多跡象顯示，印尼不僅在言論上支持阿查哈里所領導的武裝叛亂，並且曾提供軍事訓練，稍後並給予叛變的軍事領袖政治庇護，這一切正符合印尼當時所推行的反馬來西亞計劃的策略。

當組織馬來西亞的計劃被提出時，印尼即表示懷疑，認為這是帝國主義者新殖民主義政策，企圖以大馬計劃孤立印尼。因此印尼極力反對大馬計劃，蘇加諾之公開支持汶萊叛亂是可以理解的。砂共與印共同出一轍，在共同的概念下反對馬來西亞的組織。當時蘇加諾政權正受強大的印尼共產黨所左右。

砂共通過當時頗具勢力的人民聯合黨反對大馬計劃，聲勢浩大，曾經發動簽名反大馬運動。一九六三年八月下旬，當聯合國馬來西亞民意調查團抵達第三省詩巫時，三千名聯合黨黨員及其支持者，向該團示威，最後釀成暴動事件，汽車被翻覆，警察被毆傷。在示威群眾當中，有人高舉反大馬之標語，其中有一面標語是：「東姑不對，蘇加諾對。」這反映當時砂勝越共產黨所持的立場傾向於印尼，而在這之前的數個月內，印尼軍在砂共人員的引導下，曾多次襲擊砂勝

越邊境。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二日（星期五）的清晨，古晉西連縣邊境小鎮打必碌，第一次受到來自印尼的武裝份子襲擊，揭開了印尼武裝侵略砂勝越的序幕。打必碌的這次遭受劫掠，隨後他們揚長而去。跟着武裝人員又到打必碌巴利，開槍洗劫後撤退。

打必碌鎮離古晉約六十七哩，離印尼邊境三哩，座落在小山谷內，共有十六間商店，其警署在三十呎高的小山上，鎮內約有居民三百人，居民靠與印尼人物物交換為生，這是政府所許可的貿易站之一。

自打必碌遭受襲擊之後，砂勝越許多內陸地區即不斷遭受攻擊，使砂勝越政府處於軍事上的被動。

顯然的，蘇加諾政權的反大馬策略，不僅迎合了共產黨，也顯示出其擴張領土的野心。曾任大馬內政部長の伊斯邁醫生，曾揭露一項事實，「在日本佔領期間，印尼企圖利用那個時期將馬來亞拼入版圖中……隨着日本的失敗，印尼官員及印尼共產黨即干預馬來亞的內部政策，旨在使英國人離開馬來西亞後不得不將本邦交給一些要將印尼古代滿者伯夷帝國擴展到馬來西亞的人士手中。他們想以滿者伯夷帝國來代替英帝國。」⁽³⁾

稍後，馬來西亞內政部曾揭露，在大馬境內的許多政治人物，曾是「大印尼」計劃的推行者，旨在加強印尼的控制力。在這許多活躍的政治人物當中，波斯達曼是著名的一位

，他曾是馬來西亞左翼人民黨的主席，在監牢中度過多年的時光。他於一九六三年再度被捕時曾供述說：「我的長遠的政治目標是團結印尼、菲律賓、婆羅洲地區、南泰、馬來西亞及星加坡，成爲一個大馬來西亞國。如果憲制立法不能用，我認爲武裝革命是合法的」(4)。因此，他支持阿查哈里，並參觀過他的一個訓練營。

(波斯達曼現在已與馬來西亞政府合作，經常撰文譴責反對黨的民主行動黨。)

印尼對抗馬來西亞，完全獲得印尼共產黨的同意與支持。在馬來西亞境內的共產黨，特別是砂勝越共產黨組織，是全力支持這項政策的，曾經遣派支持者到印尼受軍事訓練，在邊境進行武裝活動。

汶萊的武裝叛亂給予砂共很大的刺激。英國殖民地政府爲防患於未然，開始大逮捕行動，逮捕大批知名的砂共成員，包括當時砂勝越人民聯合黨數位年輕領袖。在這種情況下，砂共爲保存其實力，號召其成員潛入印尼，接受軍事訓練，準備進行長期的武裝鬥爭。

一九六三年，估計近二千名的男女青年潛往印尼，在山口羊與坤甸一帶活動，他們視此區爲邊區，容易與砂勝越取得聯繫。一九六三年七月間，新加坡海峽時報通訊員安威自西婆羅洲森戈里社報導，約有一千六百名來自砂勝越逃亡者，正在印尼婆羅洲西部森林內，接受陸軍游擊戰訓練。

該通訊員稱：「我親眼在山口羊看到一支約二百五十名

青年華人的軍隊單位。我發稿地離邊境廿五哩之遙，離古晉約五十哩，一名屬下有七十八名當地印尼志願軍指揮官就這些逃亡戰士置評稱：「他們有不顧生命的危險。」」

大批的青年男女越境，使砂勝越政府震驚。逃亡者以古晉與成邦江兩省青年佔多數。據查，單只古晉西連路十七哩的小鎮，約有二百名青年相繼離開家園。這座小市鎮曾被視為紅區，稍後被馬來西亞政府劃為管制區。

砂勝越警方在得悉衆多青年潛逃後，即在古晉發表聲明，強調根據公安條例規定，一間住屋的屋主或居住者，在法律上有義務呈報該屋內任何居住者的不尋常失蹤的子女，他們的家長或監護人，亦須呈報。若不向縣長，砂勝越行政官、土民官或任何警官呈報這類失蹤案，犯者可被處兩年監禁及五千元之罰款。

政府發言人針對那批逃亡青年警告稱，他們非法離開砂勝越，其公民權將被取消，永遠不能返回本邦。

在逃亡越境者中，有許多是砂勝越人民聯合黨的黨員。警方曾在一次追剿行動中，逮捕六十九名青年，其中有二十名携有聯合黨的襟章。事實上，人民聯合黨在開始組成時已被共產份子滲透，這是公開的秘密。

六三年初時，政府當局曾公開揭露砂勝越共產組織已經命令其成員放棄「憲制鬥爭」的途徑，要他們從事「武裝鬥爭」。這從搜獲的秘密文件中得到証明，而人民聯合黨黨員也被訓令潛往印尼。

潛往印尼的共產份子中，葉存厚、楊柱中與林和貴是著名的領導人。葉、楊是砂勝越人民聯合黨的中委，而林和貴自學生時代即已是秘密共產組織的領袖。

一九六三年，砂共的武裝鬥爭已在印尼邊區取得立足點。於六二年中回返中國的文銘權出任砂共政治局主席，確立了砂共黨魁的地位。

由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這三年期間，砂共的許多成員偷越砂州邊境，進入印尼接受滲透的游擊戰訓練。這段期間，正是印尼蘇加諾政權加劇對抗馬來西亞時期，因此砂共的武裝鬥爭取得成長的機會。仍然潛伏在砂勝越境內的砂共成員，則積極爭取民間的經濟支援，接濟印尼邊境的部隊。

在對抗期間，砂勝越的保安部隊着重應付對抗的威脅，在砂州境內的共黨份子趁機準備安全的基地，以備供給邊境武裝份子日後回來之用。鄉村地區的青年，有些已被訓練及被組織成為作戰隊伍，而在土著間進行民族統戰工作，增加了武裝鬥爭的後備力量。

砂共在第一省及第二省邊境一帶，建立一個「指導委員會」來支配武裝鬥爭。這個「指導委員會」與州內其他各省的共黨高級幹部保持聯繫，策劃各種活動。這個委員會主持一個叫「挺進隊」的組織，在很多方面，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馬來西亞人民抗日軍」的秘密武裝組織類似。一九四八年的「馬來亞解放戰爭」，就是這個「馬來亞人民抗日軍

」的秘密武裝組織發動的。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印尼發生了一場軍事政變，這場政變顯然很快遭到挫折，但它對馬來西亞却產生直接影響。政變的結果，漸漸導致蘇加諾大權旁落，「對抗」遂由緩和而漸至消失。馬來西亞和印尼之間友善關係的恢復，打破了砂共圖以靠印尼的援助取得政權的希望。

環境與政治形勢的轉變，砂共不得不謀新的對策。原先在邊境地區成立的武裝隊伍「北加里曼丹人民軍」與「砂勝越人民游擊隊」，終於撤退至兩國交界更為崎嶇的山區，以避免馬來西亞和印尼保安部隊的聯合軍事反擊行動。砂共的武裝份子採取迂迴政策，部份潛返砂勝越境內，尋求適當的根據地。

在擄獲的秘密文件中（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揭示了砂共政變計劃的因素：

「鑒於當時印尼政局的不利，我們的組織便決定迅速將同志們分兩部份撤上邊區；一部份撤上東部。」

「為什麼要撤上邊區呢？上邊區，在地理條件優越的地方建立根據地，展開長期的游擊戰爭，以邊區作為跳板，逐漸由邊區深入到國內，然後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掌握國家政權，這是我們組織一貫來所遵循的革命路線，九·三〇事件的發生加速了我們撤下邊區。」(5)

砂共的策略是以農村包圍城市，希望模仿「馬來西亞共產黨」在馬泰邊境所採用的長期軍事戰略，在印尼領土建立

永久基地，並與印尼共產黨積極合作，然後向砂勝越採取武裝攻勢。

在一九六五年之後，軍警曾在州內多處地方發現共黨森林營寨及武裝訓練的場所。六六年初，保安部隊發現了七個建築完善的秘密匿藏所：三個在第一省，一個在第二省。這些匿藏所，是打算用來匿藏日後從加里曼丹回來的武裝共黨人員，以及作為進行游擊戰的基地。

砂共在印尼邊境所成立的武裝部隊「北加里曼丹人民軍」及「砂勝越人民游擊隊」企圖在加里曼丹建立永久森林基地，以糧食自足為前提，並且在偏僻地區，盡力取得原住民的合作。然而，六六年之後保安部隊不斷的圍剿行動，終於破壞了他們的基地，這項挫折迫使砂共組織再次改變它的武裝鬥爭計劃。

一九六九年砂共的一項秘密文件中，揭示出重新調整武裝鬥爭的政策：

「繼汶萊人民的起義和馬來西亞的成立，砂勝越人民也走上了武裝鬥爭的道路，並在一九六五年，在砂勝越和印尼的邊界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

「然而，鬥爭並不成功，因為敵人是太強而我們是太弱。主要的原因是我們沒有完全動員佔我國人口九十巴仙的工農群眾……。」

「由於這樣，北加的革命鬥爭遭受到了嚴重的挫折而處於低潮……事實表明我們的組織是很年輕的、弱小和不健全

的……。」

「我們已經在進行武裝鬥爭了，而且已經在邊區建立了二支自己的武裝部隊，但是它們仍然很弱，且經常要面對馬印反動軍隊的聯合圍剿，因而處在困難之境。因此，我們必須派遣他們回國生活在群眾中。這樣他們就能組織、武裝和幫助群眾，並在農村建立鞏固根據地。否則，我們就不能打敗敵人和解放我們的民族和國家……。」(6)

情勢的迅速變化，當新的武裝鬥爭政策確定之後，砂共的先頭部隊，被遣返砂勝越，為將返回的武裝份子的流入而鋪路。在一九六九年後半年期，是武裝份子的流入達至高峰。

回返的武裝份子，主要分佈第一省、第二省與第三省。只有殘餘的部隊留在印尼屬的加里曼丹，保留餘地，以便雙方配合。

一九六九年之後，砂共在國內發動了大規模的武裝攻擊，政府軍疲於奔命，耗費了大量的物資。一九七〇年初，政府軍在「魯諾」地區所展開的著名軍事行動——「巨網行動」，使「砂勝越人民游擊隊」受到重創。第三省拉讓江流域，更是砂共武裝份子出沒之地，在這地帶所發生的無數次戰役，使砂勝越人民蒙受戰亂的損失。

註釋：

(1)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一日馬尼拉路透社電(古晉中華日報)

(2)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耶加達路透社電

(3)馬來西亞新聞部印發：「印尼對馬來西亞的意圖」

(4)同上

(5)、(6)引自馬來西亞政府印行「贗武共產主義在砂朥越的威脅」。



第六章 公開政黨的統戰工作

共產黨一向強調靈活運用策略，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以達到鬥爭的目標。這方面，表現於統戰工作頗有可觀之處。中國共產黨能在中國大陸取得勝利，統戰工作的成功確然不可忽視，許多民主黨派已成為共產黨外圍的組織，有利於爭取民心，這給予海外共產黨許多激勵。

在星馬，由於共產黨處境危艱，因此利用公開合法的政黨作為統戰的工具，已是公開的秘密。馬來亞共產黨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時期，曾成功滲透許多公開政黨，特別是勞工黨與人民黨。在星加坡，由人民行動黨分裂出來的社會主義陣綫，以林清祥、林福壽醫生及方水雙為首的左翼份子，曾經與共產黨聯手合作，給予李光耀政府極大的壓力。林福壽醫生自一九六三年二月間被拘留，至今仍身繫囹圄，頗見其堅韌之力。雖然星馬共產黨的外圍勢力在六十年代末期遭到極大挫折，但其潛在力仍不可忽視。

砂勝越共產黨組織曾經成功地滲透砂勝越人民聯合黨（SUPP），從人聯黨（簡稱）組成的開始，即一直是共黨的外圍組織，該黨領袖在言談中也不否認這一點。一九七四年的斯里阿曼行動之後，共產黨的滲透才遭到嚴重的挫折。

人民聯合黨成立於一九五九年六月，由一群受英文教育

的知識份子及職工運動者所發起，以秘書長楊國斯爲主幹。楊氏在英國取得法律學位，是一位執業律師。

雖然，人聯黨標榜多元種族的組合，但其領導層却掌握在華裔手中，黨員群眾以華族爲主。一九五九年成立時，砂勝越仍然是英國一塊可貴的殖民地，殖民地統治者壓制民族獨立運動乃具有共同點。在這時期，殖民地所掀起的獨立運動正風起雲湧，席捲亞非各地。砂勝越人民的民族獨立運動正配合了這浪潮而展開，人民聯合黨的組成正符合了這一運動的目標。在建黨宣言中，該黨揭示出其目標：(一)循憲制方式尋覓砂勝越人民的政治進展以期最後獲得獨立；(二)爭取和維護基於議會民主制建立起來的政府；(三)促進和保證各民族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尤其是改善勞動者和經濟落後者的經濟狀況；(四)維持各民族的和諧和團結並灌輸砂勝越人民以一種自信和奮勉的精神。〔註(1)〕

人聯黨所強調的反帝反殖政綱，正迎合了共產組織的路綫。事實上，在黨的發起人中有數位是共產黨的幹部，並且已在森林的鬥爭中喪生。在第二屆中央常務委員中，文銘權出任宣教秘書，黃紀作是中央常委，他們基本上已成功滲透了該黨。一九六二年改選後的第三屆中央委員，共產組織的領導幹部已成功控制了該黨。葉存厚、楊柱中與李瑪耀都成爲該黨中央委員，稍後數年這三人都喪生在殘酷的森林鬥爭中。人聯黨第三屆中央委員計六十三名，其中三十二名是華籍，在這三十二名華籍中央委員中，有二十名曾涉及共產地

下活動而被捕，或者越境參加武裝鬥爭。

當馬來西亞計劃被提出時，人聯黨與星馬及汶萊的左翼政黨，聯手合作反對此一計劃。稍後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汶萊人民黨更發動武裝鬥爭，圖粉碎馬來西亞的組織。馬來西亞的組合概念，原是計劃由星馬及沙砂汶五邦合併，這計劃並不符合共產黨人的理想。砂勝越人民聯合黨最為反對此一計劃。該黨中央助理秘書黃紀作在一次黨的分部集會上發言指出：「五邦合併的事只有在五邦的人民都當家作主，再也不受殖民主義者操縱以後，由人民派出代表磋商決定，而不是一切都由殖民部決定，才會對五邦人民有利，才會對砂勝越人民有利。因此，我們的當前任務也和其他各邦人民一樣：是堅決進行反殖民主義的鬥爭，爭取早日自治和獨立，粉碎模糊我們鬥爭目標的任何企圖。……」〔註(2)〕

砂勝越的自治獨立，自然是砂勝越人民的願望。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由於當時人聯黨的強大，以及該黨受共黨份子所操縱，一旦獨立，砂勝越的左翼份子實有控制局勢的可能，這一點絕不是英國政府所願意看到的。因此，當汶萊人民黨的武裝叛亂，英殖民地政府也就乘機在砂勝越展開大逮捕行動，迫使砂共改變策略，進行武裝鬥爭。事實上，砂共並不贊同汶萊人民黨這一計劃，認為是操之過急，打無把握之戰。

即使是在汶萊發生叛亂之後，砂共組織遭到挫折，但是滲透人民聯合黨，以人聯黨作為掩護，仍是該組織的主要意

圖。人聯黨對砂共的重要性，可從以下一份一九六五年破獲的文件表露出來：

「汶萊起義之前，人聯黨在各地的分部與支部都很活躍，組織成功地滲透入人聯黨，特別是低層組織，故可以利用人聯黨的政治集會，文化活動，徵求會員運動等而達到目標，這目標包括：(一)向群眾公開宣傳；(二)擴展農民活動，創造必須條件以在將來建立基地；(三)克服滲透土著之困難；(四)加緊招收學生和勞工；(五)為我們的職業幹部提供藏身所。組織在这一切方面都很順利，滲入人聯黨（特別是較低的階層），尤其是顯得成功。在人聯黨的中央委員中，我們還有X和Y兩名黨員担任委員，所以我們在前頭奠定健全基礎方面，毫無問題……雖然我們通過人聯黨幹部跟汶萊人民黨的聯絡工作，因汶萊突然起義，使我們的組織措手不及，結果許多公開的政治幹部在集體逮捕中被捕。到一九六三年，我們的組織在人聯黨內的力量大大被削弱。除了被逮捕外，還有很多公開的政治幹部轉入地下活動，或遵照本組織所發出的『撤到印尼』訓令，紛紛逃到印尼去。」

這份文件又說：

「組織必須竭力控制人聯黨的各級組織，以確保人聯黨的活動和政策，與我們的目標相配合。由於人聯黨的上層是由種族的資產主義者所支配，所以在進行控制低層農民和工人方面的工作，是絕對重要的。」〔註(3)〕

人聯黨的華族領導層基本上是資產階級，但基層黨員却

來自工農大眾，受共產組織幹部所控制。像這種組合權力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雖然進行過多次肅清運動，但該黨的支部仍然操縱在鄉區的共黨幹部手中。該黨於一九五九年六月四日宣告成立，是砂勝越第一個公開合法的政黨，發展迅速，至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五日為止，在全州五省設有十八個支部，三十四個分部。黨員由一九五九年開始的三千六百多人，至一九六三年已增至四萬六千四百多人。當武裝鬥爭開始，許多青年男女越境進入印尼受軍事訓練，有許多武裝份子即為人聯黨的黨員。警方曾在一次邊境的圍捕中，逮捕許多配帶人聯黨黨徽的共黨份子。事實上，由於人聯黨的反大馬立場，正迎合蘇加諾政權，人聯黨的黨徽幾乎成為通往印尼的通行証。

人民聯合黨成為共黨的統戰組織，潛伏在該黨的幹部自然效命於共黨組織，這絕不能見容於馬來西亞政府。因此，在多次的逮捕行動中有許多即為人聯黨的幹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馬來西亞警方援引公安條例，在砂勝越州內逮捕了一百十四人。當時的副首相敦拉昔於稍後發表談話稱，在反共的突擊中所逮捕的許多砂勝越人民聯合黨的黨員是為共黨份子工作者。敦拉昔是在答覆人聯黨秘書長楊國斯所作的指控。楊氏指控說，集體逮捕的目的是要削弱在砂勝越選舉中反對黨的力量。

無疑的，多次的大逮捕確曾挫折了砂共的銳氣。許多被逮捕者很快就發表自白書譴責共黨所為，並且願意放棄政治

活動。但是，砂共的鬥爭是堅韌的，他們依據兩條腿走路的道理，並未放棄爭取人聯黨的同情與合作，在公開與地下的鬥爭儘可能取得協調；雖然在往後他們是更著重於發展武裝鬥爭。

砂勝越人民聯合黨受砂共組織滲透，曾經成為共黨外圍組織，這是公開的秘密。政府一再的逮捕行動，經已削弱了共黨在人聯黨中的勢力，直接使到人聯黨失去衆多得力幹部，而產生諸多困難。一九六四年直到一九六九年大選之前這段時期，人聯黨的黨務進展受到諸多阻碍。該黨秘書長楊國斯在一九六八年六月間的黨員代表大會上發言指出：

「由一九六四年六月第四屆黨代大會舉行後直到去年（一九六七年）為止，黨的活動有停滯下來的現象，其原因有四：（一）當時所謂印尼與大馬對抗，軍事活動使正常之政治活動發生大困難，尤其是在鄉村地區為甚；（二）對抗期間的實施多種緊急法令，使該黨在各方面都受限制；（三）政府逮捕黨的工作人員、幹部，封閉黨的支分部，使各支分部受到很大的打擊；（四）黨的經濟上困難。」〔註（4）〕

人聯黨的許多支分部遭到封閉，政府不准其活動，使到砂共在公開陣綫的活動受到挫折。事實上，許多武裝份子仍是人聯黨鄉村地區的幹部，在人力與物力的支援方面，鄉村地區的人聯黨幹部扮演積極的角色。

對於政府的逮捕行動，人聯黨領袖大力譴責是可以理解的。該黨助理秘書長田紹熙在六八年六月十日的一項群眾大

會上發言：「將來，人民對議會民主失去信心而採取武力鬥爭，聯盟政府對此須負全部責任。」稍後，砂勝越聯盟總部針對此言論發表承告，譴責此種煽動武力鬥爭的文調對於多元種族雜處的砂勝越和馬來西亞是極度危險的。〔註(5)〕

一九六八年八月間，田紹熙與另兩名砂共組織在公開陣綫工作的得力幹部，在內部安全法令下被捕。經過十四個月的拘禁，田紹熙於獲得釋放時舉行記者招待會。提到他被逮捕的原因，他說，有許多原因導致他的被捕，不過，最重要的是因為他涉及非法活動，他承認曾在經濟上支持顛覆份子進行武裝鬥爭。

詢及共產主義問題時，田紹熙說，共產主義在這裡是行不通的。他解釋稱，砂勝越是多元民族的社會，各民族歷史背景不同。他相信本州人民是支持民主制度。至於本地區進行武裝鬥爭事，他認為這是沒有前途的。〔註(6)〕

砂共組織重視公開政治陣綫的工作，這是從人民聯合黨一創始時，就肯定的。在一九六九年砂勝越州大選之前，共黨清楚地闡明砂勝越人民聯合黨充當統一戰綫政治先鋒的角色。在一九六九年四月發出的另一項政策文件，砂共組織解釋公開或合法活動與武裝鬥爭的關係。它也把鼓勵創立人民聯合黨來促進統一戰綫目標的功勞歸於本身。

「我們的統一戰綫包括合法鬥爭和武裝鬥爭兩個方面。在汶萊起義前，我們的統一戰綫是以合法鬥爭為主的統一戰綫；汶萊起義後，我們已經開始了武裝鬥爭的統一戰綫。目

前合法鬥爭在對敵鬥爭中還佔重要地位而成為主要鬥爭形式。我們的武裝鬥爭不可以脫離合法鬥爭而孤立存在。

專務的發展總是曲折的。統一戰綫中的合法鬥爭和武裝鬥爭在一定形勢下互相交替成為主要鬥爭的形式。

總的說來，在暴力鎮壓的情況下，我們的革命是否會取得勝利完全取決於武裝鬥爭。所以，在我們統一戰綫中工作不可對合法鬥爭和武裝鬥爭有所偏見而又要着眼於武裝鬥爭。

我們的統一戰綫在目前是為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統一戰綫。我們的統一戰綫應以合法和非法、公開和秘密、和平和武裝結合的鬥爭方式向共同敵人進行鬥爭……。

在砂勝越，由革命組織為領導的統一戰綫，於一九五九年開始了它新的一頁。當時，在組織的領導下，人民聯合黨開始組織。它的綱領包括了組織所提出的最低綱領中的幾點。」〔註(7)〕

從這項政策文件中可以看出砂共組織的滲透人民聯合黨，目的在於以公開政治陣綫與武裝鬥爭的相結合，進行其政治鬥爭，進而取得政權。由人民聯合黨組織之日起，砂共即開始為貫徹其目標，圖使人聯黨成為統戰的政治先鋒。這種情勢，直到人民聯合黨於一九七〇年中參加州聯合政府，成為執政黨的一員之後而有所改變。

砂勝越州大選，原定於一九六九年進行。由於六九年西馬發生五一三事件，引起種族暴動，全國處於緊急狀態，砂

州的大選因而展延至七〇年舉行。大選的結果沒有任何一個政黨能單獨執政。這種情況下，組織一個聯合政府乃被提出。人聯黨在華人所集中的城市區得到相當高的擁護，所得總票數也冠於各黨，他之被邀參與內閣為勢所需。另一方面，多年的緊急狀態，該黨的幹部相繼被捕，加以經濟的困難，該黨領導層似也認為只有參加州內閣方能解除困境；固然，有關的權位思想，種族間的合作也成為參與州政府的因素。

一九七〇年中人聯黨參加州聯合政府，楊國斯出任副首席部長。一九七一年二月間，楊氏於回答記者的詢問時表示，在州政府方面，人聯黨是屬於執政黨，但在國會中則應該屬於反對黨。〔註(8)〕

這種局面只維持短暫的時間，稍後由於該黨主席出任聯邦部長，國會中的反對黨隨之成為執政黨的成員之一。

人聯黨的參與州內閣，一時使到砂共組織進退維谷。早年人聯黨的容共至今則已開始反共，這種政策的轉變，使砂共有失去統戰效力的感覺。楊國斯於一九七一年九月間的黨代大會上作了長篇報告，他指出：

「在蘇加諾對抗時期，黨內的一些極端份子與共產份子，投到蘇加諾去，進行武裝鬥爭。他們企圖利用外國形勢來達到他們的政治目標。他們成為蘇加諾的工具，以致當蘇加諾倒台時，他們的命運也跟着完結。他們一定是失敗的，因為人民不支持他們……他們放棄了憲制鬥爭與議會民主思想，他們出賣了黨。……由於他們的反國家暴力行動，使一些

無知的人民，懷疑我黨的立場。有一些甚至以爲我黨支持暴力與武裝鬥爭。……這些極端份子和叛黨者，給黨帶來極大的破壞。」〔註(9)〕

人民聯合黨的參加州聯合政府，砂共絕對不會同意，但他們也不會就此棄人聯黨於不顧。爲了應付這個新發展，砂共組織於一九七〇年八月間發出一項新指示，希望人聯黨失去效力，或者施計使它返回統一戰綫。文件指出：

「砂勝越人民聯合黨成立後的幾年內是積極反帝、反殖、反僞馬的。其領導層也有工農的代表參加，並且在許多重要政策問題上起了主導作用。後來，由於反動政府的再三逮捕，『人聯』的領導層只剩下了反動派滿意的人物。這樣一來，『人聯』的領導就變成了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把持的機構了。」

「因此，『人聯』已經不能再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已經成爲資本家的工具。在『大選』後，由『人聯』和聯盟黨所組成的『聯合政府』已經把『人聯』的領導層變成了封建官僚買辦集團的附庸和反動工具來壓迫和剝削人民。」

「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我們怎樣來對待民族資產階級呢？我們須要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及其它民主人士過來，因此他們是我們的朋友。」

「廣大的『人聯』黨員應該繼續擁護『人聯』領導層嗎？不能，因爲他們已充當了封建官僚買辦的工具了。」

「我們堅決和『人聯』決裂嗎？相信在我們的號召下，

必定有大批的「人聯」黨員會退出「人聯」，而使「人聯」成為有名無實的空壳。但是，這樣一來，就太便宜了那些代表封建官僚買辦階級的「公開政黨」去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

「因此，我們的策略必須是『又聯合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在『鬥爭時留有餘地』。根據『又聯合又鬥爭』的策略，我們就必須抓住一切有利時機提出適當的政治口號，動員「人聯」黨員來迫使「人聯」的領導層去執行這些政治口號。現在，最好的辦法就是動員「人聯」黨員和群眾迫使「人聯」領導層實現其解放「新村」和釋放政治犯的諾言；實現不了就應退出「聯合政府」，迫使「聯合政府」倒台。

「最高的要求是使砂勝越人民聯合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不反共也不反對武裝鬥爭……。

「最低的要求是使砂勝越人民聯合黨繼續代表上層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不向封建官僚買辦投降，並在領導層中消除封建官僚買辦份子，繼續反對帝國主義的政治壓迫與經濟侵略。」〔註(10)〕

聯合政府的組成，直接打擊到砂共的利益。因此砂共的領導人通過各種方法，圖使人聯黨退出聯合政府。一名曾經長時期為砂共執行「統戰」工作的人員W君，於一九七二年被捕釋放時發表自由談話揭露，砂共首領林和貴在森林裡一次秘密接見中指示他，要他利用在人聯黨內的地位，聯絡各

支部寫反對信給人聯黨領導人，要求人聯黨退出聯合政府。

W君同時揭露，人聯黨於一九七一年召開黨代大會，砂共頭子指示要打倒溫和派領袖，如果在會議上不能通過使人聯黨退出聯合政府，就要帶領一部份人與人聯黨決裂。

當然這類指示是毫無結果。這名放下思想包袱的統戰人員，過後嘲笑砂共頭子們只會躲在森林裡發施號令，對城市裡的情況缺乏瞭解。不顧一切執行命令的結果，只有使到許多統戰人員成為犧牲品，一個個被捕。

自聯合政府成立後，人聯黨直接執行剿共政策，使地下份子不易受到掩護。另一方面，參與武裝鬥爭以及監獄中的投機者，不斷發表自白書，譴責武裝鬥爭的行為；政府積極剿共的結果，已使到砂共在森林中疲於奔命。局勢的不利，迫使砂共於一九七四年接受斯里阿曼條件，導致砂共百分之八十的兵員放下武器，走出森林。

註釋：(1)人民聯合黨「建黨宣言」。

(2)一九六二年出版團結報特輯「從鬥爭中成長」。

(3)「共產黨對砂勝越的威脅」，馬來西亞內政部印行。

(4)中華日報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地方新聞。

(5)中華日報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四日砂勝越聯盟總部文告。

(6)中華日報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日地方新聞。

(7)馬來西亞內政部印行「贖武共產主義在砂勝越的威脅」。

(8)中華日報一九七一年三月廿四日地方新聞。

(9)中華日報一九七一年九月五日地方新聞。

(10)同(4)。

第七章 新邨的移殖

砂勝越共產組織的武裝鬥爭在其開始時，幾乎是仰賴於印尼的武器與軍事訓練。六十年代初期，印尼軍不斷的犯境，間中有些是在印尼受過軍事訓練的砂勝越人。這種引敵入境的行為，砂勝越人是不恥的。不斷的軍事騷擾，使人民生活重受打擊，特別是邊境的人民。

武裝份子在古晉西成公路一帶經常出擊，危害了當地人民的耕作，在槍尖下，人民只得忍氣吞聲。一九六五年六月杪，一隊恐怖份子襲擊古晉十八哩新村的一座警署，同時爆炸廿四哩的一座大橋，使砂勝越的緊張局勢更趨於不安。稍後一連串的軍事行動，以及政府將西成路十五哩至二十六哩地區劃為管制區，飭令所有華人遷徙，設置新村移殖區，皆由此一恐怖行動所引起。

沿西成公路的許多小市鎮，附近是華人農耕地。客家屬的農民靠種植為生，這裡是砂勝越主要胡椒種植區。勤勞的農民為砂州帶來了可觀的外匯，但他們的生活却是困苦的。六十年代初期，這裡是人民聯合黨的勢力區。人聯黨的口號吸引了他們，反殖反帝反大馬，農民們也一樣跟着喊。

砂共的武裝鬥爭一開始，這一帶的青年受組織徵集，大批越境過印尼受軍訓，一時青年勞動力銳減。在往後十多年

的游擊戰中，這裡的青年喪生無數，年老的農人只有怨恨共產組織領導人，害死了他們的子女。

六五年，已經陸續有武裝份子潛返砂勝越，他們計劃在州內尋覓適當的藏身處，並且準備製造事端。在西成公路的農村地區，這裡有許多的共產組織農民協會的活動份子，因此武裝份子在他們協助下可以得到隱避處。政府早經發覺這一帶的不安，較早時就有計劃將此區劃為管制區，設施移殖計劃。但惟恐預先宣佈，這一帶的華人可能統統跑掉，直到發生十八哩警署爆炸事件時，政府即刻宣佈新村移殖計劃。

爆炸事件部署多時，這是事後砂共投誠者透露。武裝份子裡應外合，在六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夜晚，襲擊十八哩的警署，同時爆炸廿四哩的一座大橋。警方發言人指出，進攻隊伍中顯然包括印尼之滲透份子。由一個砂勝越華人所帶領，估計敵人有二十多個。警方披露，這些滲透份子曾經在砂州逗留了相當長時間，同時有證據證明進攻的隊伍是由印尼軍隊、印尼志願軍與一九六三年逃到印尼受訓的砂勝越華人所組織的。

恐怖份子在晚間十時左右襲擊十八哩的警察局，他們在短時間內佔領了警署。當時該警署只有六名警員駐守。印尼恐怖份子把警署的無線電設備毀壞並拿走武器，同時向警方人員開槍，打死兩名警察，並重傷兩名警員。喪生警員之一塞門彼得寧甘曹長，他是當時首席部長拿督寧甘之弟，故這次的攻擊事件更令政府憤怒。

恐怖份子從警局出來之後，又襲擊附近的一家華人，重傷一個華人。接着他們又襲擊第二家，打死三人重傷兩個。攻擊這些華人是認為他們不合作，用這種殘忍的手段深使鄉區的華人震驚與憤怒。

警方人員披露，敵人穿的是印尼式草綠色制服，戴着不同的帽子，配備武器精良，為美國、蘇聯及捷克製造者。該批恐怖份子由一名經已被辨認出來的砂勝越人率領。

幾乎在十八哩警署被攻佔的同一個時間內，另一批印尼人企圖毀壞二十四哩的一座橋樑。這批印尼人在該區殺害三名男性華人，其中兩名受到殘酷的刺殺，另一名被擊斃。保安部隊在十哩及二十四哩路面發現被潑上滑油，並在若干地點設立路障。

該名經已被辨認出來的砂勝越人，原居住在十八哩的村鎮，對當地情況熟悉。這名叫賴某者，稍後數年向政府投誠。當他在一次駕汽車路過十八哩時，曾被槍擊，惟未擊中，相信這是被殘酷殺害者親人的報復行為。

這一次的恐怖行動，政府採取迅速與果敢的行動還擊。在一九六五年七月六日宣佈將西成路十五哩至二十六哩之地帶劃為控制區，並且發出緊急通告，諭令該區之所有華族居民離開他們的家園，到所指定的地區報到。

控制區內不准任何人居留，出入及經過。在原居地居住的人士都被安置在十五哩、十七哩、十九哩及廿四哩的市鎮，但該區的土著居民則無遷移。首席部長的文告指出，該地

區的土著人民並無沾染共產主義色彩，並且認為共產組織引誘土著人民將永遠失敗。（註一）

移殖計劃是在當日凌晨五時起突然實施者，當局共印發了三十萬份華文緊急通告，由保安人員分派，及空軍飛機空投給該區華族居民，所有華族居民須立刻前往所指定的地區報到，並且攜帶糧食及煮食用具。

首席部長拿督寧甘招待記者時指出，該移殖區是共產黨的「溫床」，那兒的居民效忠政府者只有二十巴仙，另外八十巴仙都是親共產黨，即是共產黨人。因此政府必須要在這個地區內實施移殖計劃，以作為對該區華族居民不與政府合作的一個教訓。

首席部長的文告中指出，當局採取這項行動，目的是要保護該區居民並使他們不受共黨影響。凡遭受影響地區的華人，在政府的保護下，將被帶到所指定的收容中心。政府決心盡早把這批恐怖份子剷除，過去馬來亞的緊急時期已帶給那裡的華人十二年的痛苦。因此政府必須採取有效的措施，以確保砂勝越不致受共產黨的破壞。（註二）

這項移殖計劃，或許得自馬來亞的抗共經驗。在馬來亞緊急狀態時期，當時的英政府也在多處地方建立新村，藉以堵塞馬共勢力的擴張。

政府的情報曾經是暗藏在共產組織內的「偽共」所提供者，這管制區一向被認為是紅色區域，砂勝越農民協會及各種共黨的細胞組織曾在這裡積極活動。汶萊叛變事件發生後

，共產組織擬就計劃激起武裝鬥爭，單在十七哩附近巴都港區便準備武裝活動。

在搜獲的一份一九六三年一月出版的地下刊物曾自吹說：許多過去安份守己的農民群眾亦獻身為我們的同志送飯及成為送信人，有些地方甚至婦女也動員起來，他們不怕工作苦，犧牲家庭為革命奔走。……

當政府設置新村時，一名南越大使恰好來砂勝越訪問。他形容砂勝越局勢，好像一九五六年南越發生的情形一樣，是一種動亂的徵兆，倘若不遏止，則將會更危亂。

因此，新村的移殖計劃是成功的。農民們在管制區內不易為共產份子接濟糧食，雖然他們的接濟有時是被迫的。軍警在管制區內嚴加巡邏，使武裝份子不易活動。

政府為粉碎共產武裝份子所採取的「鐵鏈行動」，顯然已得到效果。在這項行動下的另一項「郵箱行動」，強令凡年齡在十四歲以上的人士，必須答覆下列兩項問題：是否願與政府合作及知道暗藏武器。同時請他們說出此地區內共產支持者的名字。

當局使用秘密投票箱的方法得到情報。投票站設在各居住地區內。這項行動導致近六十名人士被扣捕，他們是共產組織的積極支持者，包括一名由印尼潛返的自稱為副官的高級共幹。逮捕人士中，有人民聯合黨的中央執委與議員，他們利用各種方法協助共產活動。稍後他們在自白書內都承認曾幹過危害政府的勾當。

稍後數年，政府在管制區共設立了三個新村，用重重的鐵絲網圍住。新村內的居所是新建的，衛生設備不錯，農民們慢慢適應了新環境，逐漸減少了對政府的不滿。事實上，他們甚至感到鐵絲網內的生活是較為「安全」的，最少是這一次襲擊事件之後，恐怖份子已不能再發動另一次攻擊，居民對於殘殺手無寸鐵的婦孺感到憎惡，新村的設立可能使村民失去了某種自由，但「爲了自由」，他們只得犧牲住在管制區外的「自由」。

這項突擊行動証明了印尼侵略者的野心，他們雖然得不到什麼，但却嚴重危害了砂勝越的安全。那些引敵入侵的壞份子，他們之令人憎惡及咒罵是可以想像的。

（註一、二見一九六五年七月七日中華日報「首席部長文告」）

第八章 民族工作

民族工作是砂勝越共產組織鬥爭運動中重要的一環。民族工作的失敗，將意味着砂共武裝鬥爭的失敗。因此砂共組織在很多政策性的文件中，都強調倘若沒有土著人民的支持，革命將無法成功的事實。

在砂勝越多元化的人口結構中，華人與達雅克人人數最衆。馬來人口居第三，他們多居住在沿海地區，部份已漸移居至城市近郊。華人是城市居民，近郊的農村有散居的華人農民。達雅克人雖然分爲海陸兩種，但他們都幾乎居住在深山密林中的長屋，過着純樸與原始的農耕生活，城市的繁華並不適合他們。在森林的鬥爭中，達雅克人是砂共主要的爭取對象。砂共企圖通過武裝鬥爭，由農村包圍城市取得政權，在游擊戰中必須爭取達雅克人的支持，這是共產黨人一貫的看法。

然而，正如馬共的情形一樣，砂共基本上是以華人爲主的組織，因此，在土著間尋找支持的力量，不免遇到挫折與阻礙。以下是取自一項政策文件的摘錄，反映砂共組織在「民族工作」所面對的問題：—

「在建立群眾力量的調整準備工作中，土著民族工作是最重要而又最薄弱的一環，民族間的隔閡，語言的障礙，土

民的落後，搞民族工作的缺乏以及民族工作歷史短，致使國內（指砂勝越）民族工作的進展很小。民族工作的基礎仍很薄弱，這是對我們革命的發展的一個大障礙……。」

「民族工作是革命成敗的關鍵，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就必須要成功地推行民族工作……。」

所謂民族工作，乃指積極爭取土著的支持力量。馬來群眾的力量固然不可忽視，但達雅克人乃是砂共組織主要爭取的民族力量。砂勝越人民聯合黨曾被當作外圍組織，即使這個政黨在成立多年之後，參加的馬來人仍未及該黨員的五巴仙，但達雅克人却曾佔該黨黨員的三十巴仙以上。這之間因素自然很多，但達雅克人被地下組織或公開政黨積極爭取乃是一項事實。

人民聯合黨黨報「團結報」曾不斷撰文指出民族工作的重要性，特別是拉讓江上游地區是重要的民族區域，這些區域的工作就是民族工作。

一九六一年七月份出版的「團結報」，在「兩年來的詩巫支部」一文中指出：土著民族是爭取獨立（當時砂勝越是英國殖民地）不可缺少的力量，失去了廣泛的土著民族的支持，一切獨立將成無用的口號。……然而土著民族的覺醒和啓蒙工作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它需要面對無數的困難和阻力。……

該文指出今後的民族工作，必須重視下列三項問題：（一）做好民族宣教工作，鼓起他們的政治熱情。（二）在條件許可下

，經常召開具有區域代表性的會議，討論國內政治局勢、經濟及文化教育諸問題。(三)組織民族訪問隊，進行訪問，提供福利服務。

砂共組織的「民族工作」，可以說始自一九五九年人民聯合黨成立之後，幹部的努力宣傳，深入土著區從事各種活動，確然爭取了土著一定的支持力量。一九六二年杪，當汶萊發生軍事叛亂後，砂勝越共黨組織的大批幹部爲了逃避當時英殖民地政府的逮捕，相繼分散到鄉村地區，同時更積極展開民族工作，爲稍後森林中的武裝鬥爭鋪下了曲折的道路。

砂共的武裝鬥爭主要是在鄉村地區展開。有一個時期，爲了逃避馬印雙方的軍事追剿，更須在森林中潛伏，伺機進行勢力懸殊的游擊戰，土著——特別是達雅克族——的支持愈加顯得重要。

共黨組織的秘密刊物「農工報」，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初出版的第十八期中，強調州內非華人地區是糧食供應的來源。其中一篇文章指出：

「由於華族農民主要生產經濟物，不能吃，只能買賣，敵人的經濟封鎖會造成嚴重後果。廣闊的土族農村則有最大的戰略的經濟價值。一方面敵人不易深入；另一方面與印尼毗鄰。如果我們能提高他們的生產力，則不但可以改善他們的生活水準，而且我們也有了經濟保障。」

在理論上，共產主義認爲貧困落後的人民，更富有革命

潛力。受剝削的產業工人與貧窮的農民，乃是共產黨的主力軍。俄國與中國的共產革命似乎說明了這一點。雖然，砂勝越的土著是貧困的，特別是達雅克族，但如若以為這樣他們便富於革命潛力，那可能是錯誤的，至少現在還是如此。這或許只能解釋土著政治意識尚處於低度狀態。然而，砂勝越共黨組織却仍寄望於森林中的土著，認為他們比華籍農民更具有革命潛能。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初刊出的「勞動報」第卅一期內有一篇文章即持有這種觀點：

「從階級來看，土族農民與華族農民具有不同的特殊意義，因為土族農民在經濟生活上所受的剝削與榨取，比華族更為厲害。他們大部份是在深山僻野中，過着半原始的生活，生產力很低落，都是文盲，處於朦昧無知的狀態中，無時無刻都是處在飢寒交迫生死存亡的生活綫上掙扎。決定了土族農民具有比華族農民更為強烈的反抗性與革命性。」

砂共組織曾經通過各種途徑爭取土著的支持，在六十年代初期設立了一個「南方工作委員會」，負責加強和指揮在砂勝越州和印尼雙方邊界的「民族工作」。有一個地區設有好幾個所謂「北加里曼丹人民解放軍」的隊伍，大部份是由砂共組織的成員與其同情者所組成。

在一項關於邊界工作情況的文件中，共黨對於「民族工作」的目標，作了下列的指示：

「這種工作的目標，是在組織和加強達雅兄弟們的信念。辦法是通過進步的群眾，向他們積極灌輸我們的教義、政

策和影响……我們在進行中民族工作時所採取的重要措施，是政治宣傳和福利工作。我們的民族工作是決定我們祖國的命運。」

砂共重視「民族工作」是無可置疑的，這包括用達雅文字出版共黨讀物，提供各種福利工作，尤其是在醫療方面。達雅克人居住在深山密林中，醫葯的照顧非常缺乏。具有簡單醫療常識的共黨份子，確實能提供這方面的服務。稍後政府提供飛行醫生服務，或許是得自於這方面的靈感。

共黨組織長期派出經受訓練的幹部，滲入土著地區。這些幹部風俗習慣和語言的應用，盡力和土著打成一片，這當然能得到實際的效力，爭取到部份土著的支持。

實際情況也時有轉變。六十年代末期之後，當武裝份子大批潛返砂勝越境內時，鬥爭轉趨激烈，特別是在拉讓江流域一帶。這樣土著的支持更形重要。政府通過軍事圍剿以及心理戰術，發出高昂的賞格，凡能取得砂共份子的首級者，將可獲得賞金。於是往往一隊武裝份子在行軍時，首領走在前面，土著的隊員跟在後頭。或許是賞金的誘惑，這些土著不惜往前一刀，砍下首領的首級，向政府邀功領賞。曾經縱橫在拉讓江下游的武工隊副司令沈耀斌，即遭此一着，被自己培養的民族幹部斬首。

事實上，砂共武裝鬥爭的失敗，缺乏土著的參與支持乃是重要因素之一。投誠的前砂共領袖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一九六七年之後，砂共武裝份子由印尼潛返砂勝越，曾在第

一省邊區桑空地帶（巴達旺境）棲息一個時期。在這原始密林中，糧食與醫葯都極端缺乏，慍悍的達雅克族未給予支持，有許多武裝份子遭受殺害。稍後，由葉存厚與楊柱中領導的砂勝越人民游擊隊第二支隊二百多名隊員，幾乎都喪生在這密林中。葉楊稍後逃往第二省英吉里利，也遭到伏擊喪生。他們所領導的隊伍就此被消滅。

砂共曾在一份文件中指出「民族工作」的困難：

「土著民族對革命普遍地抱著懷疑的態度，對其他民族有所顧忌，在他們之中進行工作，困難是可以想像的。但是目前形勢的發展要求我們在土著民族中的工作，這一工作不展開，任何其他形式的鬥爭都將受限制。……在土著民族中的工作和在華族中的工作是不一樣的。在他們中，我們要充份體諒他們的歷史和社會條件所造成的落後狀態，要特別注意耐心地等待他們的覺悟。我們如果不耐心地等待就會脫離他們。」

共黨組織一再強調「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同時還訓令幹部採取適當的步驟積極工作。訓令包括：（一）在土著民族中生根立足。（二）加強民族語言的學習。（三）把組織擴大到土著民族中去，樹立起組織在他們之中的領導地位。（四）把武裝擴大到土著民族中去，動員起他們聯合其它各民族爭取政權。

砂共所揭示「民族工作」的目的是顯然的。在拉讓江一帶，還能爭取到一部份長屋居民的支持。如今，留在砂共武裝隊伍中的達雅克人烏蒙及其外甥起着相當的作用。

烏蒙是砂共首領洪楚廷的親信。他早年曾是人民聯合黨南西達分部的主席。他的積極工作以及土著的色彩，很快提高了他的地位。一九七三年他的妻子在戰爭中喪生，這或許加深了他的仇恨。烏蒙的繼續參與砂共組織，頗使政府不安。事實上，共產主義不僅是一種意識形態，同時是一種手段，他超越了時間和空間。他們相信，只有共產黨人，通過鬥爭的手段，才能改變這個人類的生活。砂勝越土著民族會否被共產組織爭取，對於砂共的武裝鬥爭是一項嚴厲的考驗。

本章參考資料：

- (一) 共產黨對砂勝越的威脅。
- (二) 人民聯合黨出版之「團結報」。
- (三) 驢武共產主義在砂勝越的威脅。
- (四) 中華日報。

第九章 砂共組織的領導層

砂勝越共產黨是一個極為嚴密的組織。即使是政府官員也不得不承認這項事實。一九六九年，當時的砂勝越仍然處於緊急狀態，其時領導叫行動理事會主席的哈倫氏曾坦然指出，砂共是世界上組織最嚴密的共產黨之一，它對砂勝越的威脅是嚴重的。

事實也的確如此，當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印尼政變之後，在印尼受過軍事訓練的武裝份子，即轉返砂勝越境內從事恐怖的武裝活動。這原因是印尼政變之後，武裝份子已無法在印尼邊境立足，加以面對印尼軍隊與馬來西亞軍隊的聯合圍剿，迫使砂共武裝份子不得不潛返國內，在邊區或是城鄉繼續從事武裝叛亂。在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數年之間，砂共曾展開頻密的活動，幾乎使政府軍疲於奔命。

是誰在領導着這個曾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嚴密的共產組織之一呢？這是一件令人感興趣的事。

自從一九七三年十月廿一日政府發動斯里阿曼行動之後，經導致五百八十多名的砂共游擊隊人員出來投誠，其中三百二十一人在第一省與第二省，二百六十四人在拉讓保安指揮部地區。率領這群游擊隊員出來投誠的是砂共領袖黃紀作與林和貴（別名林嚴華，又名民進）。他們兩人曾多年率領

武裝份子與政府軍作戰，而率眾投誠的也是他們兩人。

黃紀作早年於古晉中華中學受完高中教育，稍後轉英校攻讀英文。學生時代，已是一個激進份子，是學運的領導者，領導過罷課運動。事實上，砂共許多主要領導人，都曾參與學運的鬥爭，早年的華文中學曾是共黨幹部的訓練所，這與星馬的情形也大致一樣。

黃紀作出生於農民家庭，這頗符合共產黨所強調的階級出身良好素質。他很快的由學運領導人晉身為砂勝越解放同盟（砂共最早的高級組織）領導人。砂勝越人民聯合黨於一九五九年六月間成立，他積極投身於公開的政治活動。初期的人聯黨曾經深受共產黨組織滲透，當砂共發動武裝叛亂之初，許多人聯黨幹部越境進入印尼受軍訓，這乃是一個例証。黃紀作從事公開政黨活動，正配合了共黨的統戰工作。

紀作於一九六二年六月間在古晉被捕，同時被捕的是文銘權。文銘權是黃的領導人，我們將在稍後記述。稍後紀作與其妻被遣返中國。一九六三年砂共組織訓令其成員越境進入印尼接受軍事訓練，紀作也於此時由中國潛往印尼，並迅速成為此一叛亂運動的軍事與政治的領導人。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十二名砂共領袖在印尼坤甸文銘權住所開會，決定成立北加里曼丹人民軍，作為北加共產黨之一支戰鬥部隊。

同年十月二十六日，黃紀作以總司令身份，在西加里曼丹的「加拉央」地區宣佈成立北加人民軍，而於較早時參加

統戰部隊之砂共部隊，亦被吸收進新北加人民軍。

砂勝越共產組織另外一支武裝部隊是由葉存厚及楊柱中領導的砂勝越人民游擊隊。兩相比較，北加人民軍最初成立之五年，一般上是較為順利的。除了一些普通活動外，北加人民軍領袖亦作了個重要決定，於六八年末遣派數目龐大的各部隊成員到第二省及第三省；六九年正月至二月間亦在第三省雙溪安都地區召集會議，通過重組北加人民軍。

黃紀作一直是北加人民軍的最高領導人。從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三年間，砂共在東部地區（即第二、三省一帶）展開了頻密的軍事與民事活動，曾經嚴重地威脅了砂勝越的安全。一九七三年杪，在一次軍事行動中，黃紀作在第二省受到政府軍圍困，經過多次的談判，紀作終與當時的首席部長拉曼耶谷簽署了諒解備忘錄，而達致了斯里阿曼和平行動。

與黃紀作較為開朗的性格相較，林和貴則似乎顯得沉着與神秘。自葉存厚與楊柱中於六九年時在戰鬥中身亡，同時也導致了砂勝越人民游擊隊第二支隊的潰滅，此後林和貴顯然與黃紀作有着相等的重要領導地位，林在第一省掌舵（西部地區），而黃紀作則是第二與第三省（東部地區）的最高領導人。

林和貴（民進）在五十年代末期於古晉中華中學受完高中教育。出生於工人家庭的他，家境貧困，很容易接受了共產主義的革命理論，相信唯有通過共產主義的武裝鬥爭才能建立美完的社會，這正是五十年代一般受華文教育的知識青

年所具有的看法。民進很早即參與了學生運動，畢業後更積極參與砂共組織的領導，他曾是砂共的組織隊長。從這裡可看出他的領導才能。性格上顯得並不活躍的他，似乎更著重於共產主義理論的進修。政治部官員可能是在很久之後才發現民進在共產組織中的高級地位。

許多與民進共同戰鬥多年的幹部，都認為他是一個寡言笑，而近乎殘酷的領導者。這一點從投誠者的自白書中揭露可見一二。對於不接受訓令的下屬，民進採取殘酷的手段，被槍斃也不奇怪。

由於思想分歧，民進與葉楊（葉存厚與楊柱中）發生衝突。事實上這是一種派系與權力的鬥爭。不和事件早在一九六四年於西加里曼丹的新加灣地區就萌芽，而於一九六七年初在砂印邊境的森林地帶「雙空」衝突更為激烈，由領導層鬧到部隊。

以葉存厚為首的一派主張發動大規模的戰爭與印尼和馬來西亞對抗。葉楊以為發動「人民戰爭」可以使砂共重燃起「革命火焰」。但在那艱苦的歲月，這項計劃是徹底失敗了。

林和貴與黃漢所率領的「火焰山部隊」，與葉楊劃分界限，採取不同的策略。六八年初，他們的部隊遭受追剿，首領率領了十二名護衛，離開三發坡，由水路來到砂勝越第一省海口區的怒諾。他們於八月中抵達沙邦地區，並在該處設立一個指揮中心。其後數月，行動非常活躍，並取得下列各

項成果：

- (一)重組首省委員會；
- (二)開辦思想學習班；
- (三)在海岸區展開建設工作；
- (四)設立軍火製造所；
- (五)召集印尼精兵至中央。

六九年八月，砂共在怒諾沙邦重建龐大勢力。同時宣佈成立北加里曼丹共產黨，並把砂游擊隊及火焰山部隊重組為北加里曼丹人民游擊隊。

顯然的，林和貴以其領導能力，很快的在第一省內重建了砂共原已衰退的勢力。他將他所在的據點稱為「指揮中心」。然而，時間的發展對砂共甚為不利，加以組織內部的權力鬥爭，思想分歧，導致許多砂共的重要幹部接二連三的出來投誠，並對林和貴的領導發出諸多挑戰。不出數年，也就是一九七四年初，林和貴率其部層接受了政府的「斯里阿曼行動」，宣佈放棄武裝鬥爭，結束了十多年的森林裡的鬥爭。

一九七四年初的斯里阿曼行動，導致數百名共黨游擊隊員放下武器，重返社會。顯然的，這項行動的決策者是黃紀作與林和貴。遠在北京的砂共領袖即北加里曼丹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文銘權，公開嚴厲譴責這項斯里阿曼行動乃背叛與投誠。文銘權的譴責激怒了黃紀作與林和貴。這兩名前共黨組織的領袖指文銘權只是有名無實的主席與領袖。現在武

裝鬥爭失敗，而他却發出一項聲明批評與形容北加人民軍與北加人民游擊隊領袖為背叛者。

這兩名前領袖公開指出：「除了幾次通訊外，文銘權與北加共產黨與其真正領導層的聯絡在過去八年來非常鬆懈。文銘權不曾經驗到共產游擊隊所遭受到的困苦，且未曾給予北加共產黨任何積極的支持。因此，這位在外國不曾與其中中央委員會委員晤面的所謂主席是沒有資格發表聲明的。

砂共前領袖指責其上司文銘權的聲明發出後，引起了各界的注意，人們對作為共黨組織最高領導者的文銘權，頗感興趣。事實上，文銘權離開砂勝越已很多年。他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廿二日在古晉被捕，同年六月廿七日被遣返中國。一九六三年初他潛回砂勝越，在印尼邊境領導砂共的游擊活動，成為北加里曼丹共產黨的總領袖。

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印尼政變前夕，砂共為了保護領袖個人安全，文銘權離開西加里曼丹前往中國，並把武裝鬥爭的指揮權委託予黃紀作與林和貴。自那時以後，這名共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即在外國過着寫意的生活。

人們往往認為搞地下活動的共黨組織領袖是很少公開露臉的，原因是少受當政者的注意。然而，文銘權却不然。五十年代中期，砂勝越出版一份報章「新聞報」，通過這份報章的宣傳，共黨組織迅速獲得廣大的支持，特別是農村地區的農民。文銘權即是這份報章的主編。（葉存厚也同時是新聞報的編輯）

砂勝越人民聯合黨於一九五九年成立，文銘權是發起人之一。但由於英國政府的注意，他並沒有列名在黨的發起人行列。稍後，文銘權成為該黨的宣教秘書，同時主編黨報「團結報」。這時期的文銘權非常活躍於公開政治活動，他是人民聯合黨的古晉市議員，同時被選為省諮詢議員。

然而，更使人興趣的是這時期他已是砂共組織的最高領袖。或許他有意從公開活動中獲取聲望。一九六二年初，他有意前往新加坡出席一項左翼工運會議，被李光耀政府拒絕，新加坡政府同時公開揭露文銘權的共黨領袖身份。那一時期，星馬與北婆三邦的情報機構是統一的，英國人從各種証據中揭露文銘權是共產組織的領袖。稍後，文銘權與黃紀作同時被捕，並在數天後被遣返中國。

五十年代初期，當文銘權還在古晉中華中學讀書時，他已是砂勝越解放同盟的領袖。那段時期，學運迅速發展，通過罷課活動，共黨組織訓練了許多幹部，在反殖反帝的口號下，許多青年很快被動員，學習共產主義理論，搞地下活動，可以說，這是砂共的成長期。文銘權很快的在組織中建立了聲望，掌握了權力，那時期，英國政府已有計劃退出砂勝越，而左翼勢力迅速成長，這些搞地下活動的組織者，幾乎認為權力已在握，連英國殖民地政府也不看在眼裡，囂張而拔扈。

認識文銘權的，都覺得他寡於言笑，幾乎是陰冷的。或許，這正是某些搞地下活動者共同性格。由於組織的訓令，

當他還差一年未修完高中課程時，即已退學積極參與組織活動。砂共最早的組織者之一張榮任可能在這時期（五十年代初期）已在印尼邊境潛伏，因此，指揮權也就轉移予文銘權。配合着有利的局勢，共黨組織在砂勝越展開抗英活動，文銘權的組織能力在實踐中得到信任，很快建立了新黨魁的形象。

出身農民家庭的文銘權，現時仍然寄居北京。一九七六年，中國領袖周恩來、朱德與毛澤東相繼逝世，文銘權以北加里曼丹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發出唁函。周恩來總理於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在北京逝世，文銘權在悼詞中譴責了某些前砂共領袖的投降路線：

「我們黨將會繼續反對黨內的修正主義思潮和逆流，為把黨建成一個堅決革命，團結一致，並能領導我國（指砂勝越）人民進行一場偉大政治鬥爭的核心，把當前全面清算右傾機會主義投降路線的關鍵任務搞好；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堅持走鄉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為爭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誓把革命進行到底。」
（註一）

文銘權遠居外國，能否以遙控的方法來領導砂共的革命，這倒是令人深感興趣的。

註一：中國北京光明日報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第五版。

第十章

砂共的軍事組織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汶萊人民黨的武裝叛變，影响所及，英殖民地政府展開大逮捕行動。砂共不得不轉入地下，大部份成員越界進入印尼受軍事訓練，開始走上武裝鬥爭的道路。

一九六五年九月十九日砂共在印尼北加里曼丹坤甸召開了高階層領袖會議，由文銘權主持，多位中委皆出席了會議。會議決定成立北加里曼丹共產黨和武裝部隊。軍隊分為北加人民軍和砂勝越人民游擊隊。前者負責北加東部，後者則負責北加西部地區。

黃紀作統領北加人民軍，負責詩巫省及泗里奎地區。

印尼九三〇政變之後，砂共在印尼的日子益發不好過，遂決定將部隊撤回邊區與國內，準備在國內展開武裝鬥爭，利用砂州的茂密叢林作為軍事基地。

黃紀作稍後即在拉讓江流域領導武裝部隊。一九六八年，黃的部隊正式在拉讓江南西答（土著區）與洪楚廷及其部下會合。

洪楚廷並沒有越過邊境到印尼受軍訓。他所率領的一批地下份子，白天潛藏在羣衆的家裡，晚上出來活動。這些活動包括召開組織會議，搞學習小組等。

一般上，楚廷被認為善於搞羣衆工作，具有組織才華，不過，缺乏軍事上的領導經驗。

在這時期，洪正式受委北加里曼丹共產黨中委兼北加人

民軍總部領袖之一。在砂共領導層中，中委職位最高。中委之下有省委、縣委、區委等。在緊急狀態時期，政府曾懸賞極高的數額予提供情報者，導致任何中委受擊斃或遭逮捕。

洪楚廷領導的武裝部隊在拉讓江流域展開鬥爭。許多年青共產黨成員不斷加入他的隊伍，這是砂共武裝部隊的興盛期。

拉讓江流域的武裝部隊分為三個軍區。即（一）上游軍區（二）**OMT**軍區及（三）下游軍區。

第一軍區的轄區範圍為加拿逸以上，由貝文對及楊會強領導。

第二軍區是民族工作區。**O**是**OYA**烏譯。**M**是**MUKAH**木膠，**T**是**TATAU**達島，統稱為**OMT**武工隊，由王連貴領導。

第三軍區是民那丹，泗里奎一帶，由黃理生領導。

軍區的總領導人是洪楚廷。洪即是北加共產黨中委，而軍隊是由黨領導，很自然的，洪是這支部隊的指揮官。

從一九六八年抄，洪自邊區帶回三十多名砂共份子，到一九七二年初，部下人員增至六百多人，這種勢力膨脹不能說不驚人。

政府必須動用各種力量來圍堵共產黨勢力的擴張。一九七二年三月，政府將詩巫、泗里奎及加帛宣佈為特別保安區，並設立拉讓保安局。這是一個有效的行動，否則拉讓江流域恐怕會被赤化。

一位曾是砂共的高級領袖在接受訪問時談到這一段時期的鬥爭：

砂共地下份子一度能在拉讓江河上若無其事地行舟而不需擔心身份被當局揭露，他們連光天化日，走進詩巫市區而似入無人之境，這是拜羣衆基礎好所賜。

拉讓江共產武工隊跟當時印屬加里曼丹邊區及古晉、斯里阿曼省的游擊隊之際遇完全不同，他們竟能在森林中過「豐衣足食」的生活，要不是由親身經歷過那種林中生活的要員講出來，這的確是令人難以置信。

據說：「當時，我們享有大魚大肉，最好的藥品源源不絕地供應入林，連補品都不缺乏，所到的一些村莊，人民羣衆熱烈歡迎，還爲我們把風，殺豬和鷄鴨款待！軍方圍剿時，他們保護我們，指引我們的最安全的地方，爲我們提供警惕訊號．．．．．」

這不單是華人區，連達雅區也有同樣的情形出現。

「開始到土著區活動，導致的砂共人命損失遠比軍事活動嚴重，長屋居民長期受到官方反共宣傳所影響，一見到我們出現，許多達雅婦女真的全身發抖。」

許多砂共人員因土著居民向政府通風報訊，結果丟了命，「我們即使知道是誰去通風報訊，也不能進行報復，只當他們受誤導，因爲一開槍報復，我們就更洗不清洪流猛獸的恐怖形象．．．．．」

在七十年代初期，砂共勢力在拉讓江迅速擴大，具有多種因素。

一位前砂共軍事領袖在一次談話指出。

「洪楚廷和他早期的幹部在拉讓江流域已活動很長時期，具有相當威信，思想教育已經見效。洪有相當的組織能力，一旦有羣衆基礎，武工部隊一成立，召募隊員即來得順暢

。〔另一方面，對砂共武裝部隊而言，拉讓江流域還是個新區，接受了共產思想灌輸的羣衆對武工隊的出現寄以厚望，一個家庭幾個成員披甲入伍乃很常見。〕

七〇年，反帝反殖，倡揚〔婆羅洲三邦主義〕、反大馬計劃的人民聯合黨已結束了十一年的反對黨鬥爭路綫。諸多鄉區勞動階級人民一時適應不來，反將希望寄託在建立有武裝力量的砂共組織身上。

過去，這些以勞動階級自居的鄉村人民跟人聯黨一起喊：〔不愿被壓迫的人們！不愿被剝削的人們！不愿做奴隸的人們！讓我們團結起來！〕人聯黨參與執政黨，口號當然中庸化，再加上人聯政策路綫改變之解釋和宣傳仍未有效傳遞到鄉區各角落，這造成無可適從的鄉區羣衆改成跟砂共〔團結〕，很輕易地成爲砂共〔團結的對象〕。

砂共的策略本來就是〔大力密切地聯擊羣衆的過程中、吸收新的成員〕、〔大力的動員和組織起來支持和參加武裝鬥爭，加速我們的武裝鬥爭〕，並肯定〔大力密切聯繫羣衆是革命和武裝鬥爭進一步發展的最決定力量〕。

鄉區的落後，人民的貧困，再加上精神思想上對人聯黨參與執政黨的改變無所適從，砂共成功乘虛而入。

砂共武裝力量的強大，拉讓江流域一帶幾成了他們自由出入之地區，七三年三月，政府展開積極的保安行動，設立拉讓保安局，方使得砂共受到軍事上的挫折。

相比之下，砂共在首省的軍事活動則顯得有所不如。砂勝越人民游擊隊由林和貴、黃漢以及沈友貴所領導。它的成員大抵在印尼受過軍訓，但由於政府軍強大壓力，以及地理環境的約束，砂共武裝部隊只能偶然突擊。

另一方面，權力鬥爭的惡化，投誠者對於砂共的打擊更是致命傷。因此它的軍事組織力量遠不如拉讓江流域。

一九七三年杪，黃紀作與首席部長簽署諒解備忘錄，從而結束北加里曼丹西部（即古晉省和斯里阿曼的武裝鬥爭。此舉也導致東部（拉讓江流域）地區的軍事組織的瓦解。



第十一章 一支部隊的消失

一九六五年九月杪，印尼共產黨發動一場流產政變，這場政變導致印共大傷亡，印共領導人艾廸也於政變中喪生。這場政變同時結束了蘇加諾時代，代之而起的是蘇哈多。這場政變，使砂勝越共產黨失去了以印尼作為緩衝基地，稍後於撤回砂勝越時，砂共喪失了主要的兵員。可以這麼說，倘若印共不發動這場流產政變，東南亞的部份地區恐怕不是現今的局面。

印共發動政變的前夕，砂共黨魁文銘權率先潛返北京，因此，其領導的工作則交由葉存厚、楊柱中、林和貴、黃漢與黃紀作負責。葉楊率領一支部隊，林黃率領另一支部隊，而黃紀作所領導的北加人民軍則潛往第三省拉讓江流域，這正是三分頂立的局面。

印尼陸軍的加強圍剿砂共武裝份子，迫使砂共的游擊隊退回邊區，開始數年的邊區流竄。在這數支隊伍中，葉楊所率領的第三支隊，原是一支強大的部隊，兵員強大，武器配備充足。第三支隊開始時有一百八十多名武裝人員，政委葉存厚，司令楊柱中，宣教黃祥明。

這支部隊於一九六六年開始撤回砂印邊界的雙空山地區。雙空山的原始處女林，遮天蔽日，達雅人的村落散居山中

，落後的達雅人過着貧苦的生活，倘若以共產主義的觀點，這些貧困的達雅人應該是革命的民族，但情況恰好相反，雙空地區的達雅人並不同情武裝鬥爭。

一九六七年中，印尼開始派兵進攻第三支隊的民運隊，打响了第一次的圍剿戰。在多次的駁火中，第三支隊已有數名隊員被擊斃，領導人估計雙空山基地的形勢不易固守，於是決定大隊全部轉移，只留下一些小隊在原地進行騷擾戰。

大隊稍後轉移至峇拔山，並在四周築預防工事。這時大隊約有一百人左右，駐紮在各長屋周圍。峇拔山的山勢比雙空山更為陡直，山脚下是士加央河，河流湍急。

印尼軍隊的圍剿，猛力進攻，經過多次的駁火軍事行動，砂共第三支隊遭到損兵折將之痛；加以後援不繼，傷亡的隊員一天比一天多，糧食不足，造成第三支隊只能處在被動的地位。防守既不易，進攻更困難，達雅族人的不友善態度，使到部隊處境艱苦。

一九六八年底雨季開始，隊伍只剩下七八十人，第三支隊仍然在轉山頭，躲避印尼兵的追蹤，那時糧食已吃光，只好靠木薯葉、榴槤核、野菜充飢，有的隊員由於飢餓過度，腳開始腫，有的臉也腫，走路時寸步難移，更何談戰鬥。

砂勝越警方曾在圍剿中搜獲葉存厚的日記，保安行動委員會曾將這本日記公開展出。日記記錄了雙空地區的游擊生涯，可說是第三支隊的血淚記載。

日記寫道：自一九六五年杪以後，砂共游擊隊即時刻面

對印尼軍隊的圍剿，過去蘇加諾時代的優遇已不復存在。

六八年的日記中，葉存厚記述道：在農曆新年時，吃的是甜薯、竹筒米、雞蛋（有兩隻雞），一些榴槤和紅毛丹，晚餐吃得很快樂。雖然已有數個月沒有油和鹽。

飢餓時，隊員們吃大螞蟥、蛇、竹筍和樹葉。葉的日記記載：飢餓、飢餓，你破壞了我們的身體，苦惱了我們的思想，但你不能征服我們的紅心。

在日記快結束時的一段日子中，葉存厚曾悲痛寫道：隊員飢餓時，吃蜈蚣、蝎子、毒蛇、燒烤大螞蟥。吃竹筍的結果導致腳軟、虛弱，即使想打獵，也不能勝任。

葉的日記更恐怖的記述：隊員吃腐爛的肉，死老鼠的骨與皮，並且覺得味道不錯。這種情況下，我（葉）很難想像，不會吃人肉。

飢寒交迫，加以印尼軍的圍剿，第三支隊死的死，逃的逃，至一九六九年二月間，隊伍僅剩下三十人左右。其中有幾次遭遇埋伏，一下就死去六、七人。在這種大批死亡，而毫無補給的情況下，第三支隊已變成一支殘兵了。

六九年的三月杪，第三支隊再次中伏，政委葉存厚與司令楊柱中也犧牲了，其餘的隊員被冲散，結果多數被俘虜。第三支隊到五月間已全軍覆沒。

第三支隊的覆沒對砂勝越共產組織的武裝鬥爭無疑是一項巨創。它的失敗一方面是印尼軍的圍剿，加以本身兵員不足，森林裡的民族不支持，糧食的補給困難。但另一方面也

是砂共組織的權力鬥爭所致。

葉楊與林嚴華、黃漢的權力鬥爭，導致意見分歧。林嚴華與黃漢稍後更率領其部隊移師怒諾海口地區，重建其部隊勢力，而林黃的離去，也斷絕了葉楊部隊的糧食供應。

葉存厚的日記曾嚴厲譴責林黃二位。他譴責林黃的錯誤路線，導致劉順勝等的死亡（劉順勝曾任新聞報經理，共產組織的高級幹部），導致印尼邊界一個華人鄉村的消失。日記怒斥道：黃漢與林嚴華，你們的罪過是不能洗脫的。（六七年七月十八日的日記）

林嚴華與黃漢稍後率領其部隊在海口地區取得據點，建立所謂「指揮中心」，在一次批判大會中，曾對葉存厚與楊柱中嚴厲的批判，並認為這是敵我的鬥爭，而非普通的意見分歧。

葉存厚的日記記載了許多戰亡的隊友，包括朱增仁、黃祥明。朱與黃乃是早年葉楊的同學，稍後一起越過邊境，領導共產黨的部隊。

日記中所記述的被逮捕的賴春（林廣民），來自詩巫，早期從事職工運動，一九六三年一月份與葉楊越境赴印尼。賴春曾與汶萊政變的領導人阿查哈里在印尼共事，出任流亡政府的財政部長，乃是一位高級領導人。稍後，賴春出獄，曾任砂勝越首席部長的特別助理。

第十二章 砂共與華人社會

——巨網行動與誅達行動——

砂勝越共產組織所具有的華人特性是很明顯的。雖然，共產組織曾努力於拉攏吸收其他土著的參與，特別是深居森林中的達雅族居民，但並未獲得顯著的成果。可以這麼說，共產黨未能在砂勝越取得勝利，民族工作失敗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這一點，砂共領袖曾公開承認。

砂共組織以華人為主幹，這與華人的思想意識形態深受左傾思想的影响關係重大。當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取得中國大陸政權時，曾給予海外共產黨很大的激勵，馬來亞共產黨以及當時的砂共地下組織都為此雀躍。此後，砂共即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以共產中國取得政權的武裝革命鬥爭方式為依據，企圖在砂勝越通過武裝鬥爭取得政權。雖然砂勝越政府曾否認中國政府給予砂共任何形式的援助，不過砂共所依據的理論指導却是來自中國，再結合砂勝越的實際情況而產生行動指南。

砂勝越政府曾努力斷絕砂勝越華人給予共產組織的援助，建立新村，移殖鄉村居民，以斷絕糧食的供應。無數次的大逮捕行動，其目的也在於挫折共產黨勢力的伸展。

砂共的領導層，許多來自早年的學生運動領袖，而武裝成員則大多來自農村的華籍青年。政府的大逮捕行動，往往

是對準華籍人士，而不幸的每一回圍剿軍事行動，傷亡者大多為華籍人士，因此，在十多年的武裝動亂中，華族的傷亡以及財物損失是鉅大的。農村破產，民不聊生，導致有些村落的凋零。至到後期，原先砂共武裝鬥爭的同情者與支持者，也逐漸產生離心現象。

砂勝越政府於一九七〇年二月廿四日採取「巨網行動」，封鎖圍剿古晉海口區的共黨武裝份子，是一項嚴厲的軍事行動。怒諾縣位居古晉海口區，乃一農耕盆地。一部份砂共游擊人員於六八年由印尼潛返此間，即在怒諾縣建立「指揮中心」，進行軍事訓練。隨後數月，行動非常活躍，並取得多項成果。

六九年八月，砂共在怒諾沙邦重建龐大勢力，同時宣佈成立北加里曼丹共產黨，並把砂游擊隊及火焰山部隊重組為北加里曼丹人民游擊隊。

人民游擊隊亦分成三小隊，即：

一、怒諾區之第一小隊；

二、倫樂區之第二小隊；

三、西連區之第三小隊。

自六八年中至七〇年初，古晉區的共黨勢力有顯著的增長，地下組織募集許多年輕幹部到海口區進行軍事訓練，目的是重組強大的游擊隊。在林和貴及黃漢領導下，重組共黨的省級委員會。

然而，這項秘密行動於七〇年二月間遭受政府軍事行動

委員會破獲，並展開「巨網行動」追剿共產游擊隊。

四月間，政府宣佈此行動實施以來，已擊斃共產份子達三十八名，俘虜十三名。一名砂共高級幹部曾繁浩被擊斃。曾繁浩是砂共一名省委，曾在十七哩中華公學任教，一九六七年越過邊境到印尼去。

「巨網行動」對共黨是一項巨大打擊，但砂共仍餘下完整有力的部隊，稍後轉移到峇哥地區之布達伯岡重建新的指揮中心。七一年三月八日，砂勝越政府在峇哥進行一項打擊行動中，迫使砂共再將總部遷移至三巴里，馬當森林區，並展開一系列之軍事練習，此外，亦組成兩個新部隊，以保衛及支持這個北加人民游擊隊總部。

政府的軍事行動對砂共是一項重創。另一方面，政府已查悉不少公眾人士曾給予共黨財力與物力的支援，這些公眾人士甚至包括許多華籍社會領袖與百萬富翁。砂共的武裝部隊能夠在拉讓江區域迅速擴展，部份原因乃是取得這些公眾人士的支援，雖然這些支援有些是被迫的。

一九七三年九月廿二日，砂勝越州首席部長兼行動主任拿督耶谷宣佈，警方在詩巫展開「誅達行動」，有三十名人士在維護公安條例下因跟北加里曼丹共產武裝份子勾結而被拘留。其中包括一些著名人士及商人。

首長在一項文告中詳細指出「誅達行動」的動機。

「警方調查的結果，發現供應接濟整個拉讓保安地區內恐怖份子的組織的主要來源為詩巫。我驚悉在詩巫有不少社

會地位極高的人，明知故犯跟恐怖份子勾結。有些私人醫生供應醫藥品，包括抗生素及免費診療。有一些雜貨店店主供應食米與食物；有些書店與印刷所老板供應紙張、油墨及其他文件給恐怖份子組織。其他有力的支援包括大筆現金，其中一筆巨達一萬元以及可以製造槍枝來對付人民的器材與原料。

「這些有地位人士一向十分幸運能享受到較多舒適與安全，一向被認為應作領導，被認為是效忠公民的良範，而他們作出對國家不效忠的行為，實在令人可憎。這些受捕者及許多其他人的支持，無疑的已激勵了恐怖份子繼續他們的無意義反國家暴力鬥爭。

「我於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九日就消滅六名恐怖份子的新聞稿中，曾敦促涉及支持恐怖份子組織的人，自動前來向當局報告，儘早跟有關當局解決他們的案情。較後於一九七三年七月廿八日，我對同樣事件提出嚴重警告。這些警告最後刊登在政府傳單中，於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四日空投分派在拉讓保安區，特別在詩巫市鎮。儘管當局作了這些種種努力，甚至沒有一個涉及這種不效忠行為的人響應這些警告跟政府合作，這令我極感失望。

「政府對馬來西亞效忠公民需負起責任，因此政府不得不採取適當的公平的措施，來對付那些不利用諸多機會向當局清理他們案情而繼續公然協助顛覆活動的人。

「在對付恐怖份子方面，政府已動用了巨款，並將繼續

動用巨款，而且已有許多效忠公民因而犧牲他們寶貴生命。我欲重申，政府有責任向人民確保法律與秩序的維護，任何人不論他的社會或政治地位，如果違法必須受到懲罰。

「我相信在詩巫及其他市鎮，可能還有人同樣通敵而尚未向當局報告。這些人，我欲再度警告他們即刻向當局報告，以免太遲。政府決不容忍任何對國家不忠的行爲。

「自拉讓保安區成立以來，共消滅敵人一百十九名，其中許多受俘者是詩巫市鎮內直接與積極負責施行分發傳單，收集情報，徵募青年與學生，收募捐基金，糧食與藥品以及向公衆人士獲取其他供應接濟的份子。

「同時也有許多效忠公民自願提供可貴報告，包括許多社會上有地位的人士。他們像極大多數馬來西亞人一樣，真誠地盼望看到本國享有和平與繁榮。

「我也欲指出，幾乎每一個自首被俘的恐怖份子，都自願合作，提供有情報價值的資料。

「那些繼續支持恐怖組織的人，正冒極大危險，因為他們不效忠行爲，遲早會被當局發覺。因此我必須一再向他們警告，政府將會毫不猶豫採取適當措施與行動，來對付任何被查悉那些支持恐怖份子的人，不論他的社會地位高低。」

這些被拘留人士名單如下：

- | | |
|--------|------------|
| 1. 陳則頌 | 詩巫女皇道卅八號 |
| 2. 林恩洲 | 詩巫馬克街二號 |
| 3. 趙增榮 | 詩巫烏魯烏驛路第一巷 |

- | | |
|-----------|-------------|
| 4. 丁永超 | 詩巫興裕園十九號 |
| 5. 鄭傳景 | 詩巫布洛克道 |
| 6. 許如順 | 詩巫烏驛路二哩一〇五號 |
| 7. 丁仲敏 | 詩巫布魯望路十一號 B |
| 8. 柳承彬 | 詩巫宋溪美碌 |
| 9. 魏順蓮 | 詩巫布洛克道十九號 |
| 10. 黃聿傑醫生 | 詩巫打鐵街十六號 |
| 11. 許慶南 | 詩巫教會路六十一號 |
| 12. 鄭元石 | 詩巫宋溪安都四十二號 |
| 13. 黃禮秋 | 詩巫中央路五十號 |
| 14. 葉立德 | 詩巫華僑路 |
| 15. 劉其鳳 | 詩巫東山路八十號 |
| 16. 陳國僑 | 詩巫邱炳農路十號 |
| 17. 蕭招冬 | 詩巫華僑路十六號 |
| 18. 吳慶發 | 詩巫華僑路卅二號 |
| 19. 李培新 | 詩巫邱炳農路七號 |
| 20. 黃江涵 | 詩巫打鐵街廿四號 |
| 21. 周振裔 | 詩巫拉敏街十九號 |
| 22. 何餘厚 | 詩巫中華路五十九號 A |
| 23. 劉文華 | 詩巫教會路卅五號 |
| 24. 何仕松 | 詩巫德大花園十二號 |
| 25. 何有明 | 詩巫中華路 |
| 26. 蕭孝江 | 詩巫拉讓園五巷五十九號 |

27. 黃和順 詩巫女皇道一百卅九號

28. 許家棟 詩巫南蘭路

29. 拿督林鵬壽 詩巫愛蓮街十三號

30. 拿督黃傳寬 詩巫女皇道

三十名人士中，許多是著名商人及專業人士。

林鵬壽是銀行家及木材業鉅子。曾任國會議員，是砂華公會的前任會長。

黃傳寬為木材商人。

陳則頌為木材商人。

丁永超是一名繪測師。

丁仲敏律師曾任砂州首任首席部長拿督史蒂芬加隆寧甘的政治秘書。

黃和順是人民聯合黨詩巫支部秘書。（一九七四年中選為詩巫市區國會議員）

這些人的被捕曾轟動了砂州社會。政府的目的是斷絕共黨組織的經濟支持綫。稍後，這些被捕者多數發表了公開自白書，並很快得到釋放。

事實上，拉讓保安區此項逮捕行動不久，政府經已秘密開始與共黨領袖進行和談，而達至一九七四年的斯里阿曼和平行動。

第十三章

斯里阿曼行動的結局

一九七三年十月間至一九七四年三月間，砂朥越州政府所展開的一項和平行動，謂之斯里阿曼行動，對砂朥越來說是一項極為重大的事項，對整個馬來西亞來說，也具有特殊的意義。對砂朥越共產組織的鬥爭歷史也是一項轉捩點，或者可說是一項極大的挫折。砂共所展開的十二年的武裝鬥爭，至此遭到嚴重挫敗。

這項行動，先後導致近六百名的共黨武裝份子放下武器，走出森林，重歸社會。從共黨的鬥爭角度來看，這是一種投誠。因為歷史上並沒有放下武器的共產黨的武裝鬥爭。事實上，砂共領導人的這項行動，乃是迫於內外交困的情況作出的重大決策。

經過十幾年的武裝鬥爭，砂共並未獲得任何成果，由於戰亂導致人民羣衆對它的背棄，數年內大量武裝份子相繼走出森林投誠，已顯示對砂共領導失去信心。黨內的權力鬥爭，兵員不繼、糧食供應短缺，經使砂共領袖面對困境。七〇年之後，人民聯合黨與土著黨所組成的聯合政府，一再安撫投誠者，寬大的政策動搖了森林裡的武裝份子。砂共領導人在與州政府領袖取得聯絡後，經過數個月的秘密談判，遂有此行動的宣佈。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初，砂共高級幹部吳鉄與林輝通過電台呼吁森林中的武裝份子放下武器，出來投誠，已徵示着砂共黨內將有一場重大變動。稍後砂州首席部長耶谷公開揭示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三日，北加里曼丹人民游擊隊高級領袖及北加人民軍主任兼政委的黃紀作，親自致函首長兼行動主任的拉曼耶谷，表示願意放棄武裝鬥爭並在馬來西亞憲法範圍內為政治與社會改變而工作。

和平談判的過程，迂迴曲折，一切都在秘密中進行。黃紀作於十月間派其特使黃紀權（紀作之弟）持其親筆信，往見拉曼耶谷，謂紀作有意與首長會面。於是雙方預定於十月十九日在成邦江會面。黃紀作坦誠表示有意放下武器，帶領部屬重歸社會。十月二十一日，首席部長與黃紀作在成邦江斯里阿曼館舉行諒解備忘錄簽署儀式。和平談判至此已獲得初步的成果。

在七三年十月間至七四年三月間的談判過程中，砂勝越廣播電台經常有暗示性的通告，指示雙方（包括軍方）的行動。

一九七四年三月四日，和平談判獲得重大成果，砂州政府宣佈已有七十五巴仙的共產戰鬥部隊，其人數約為男女四百八十二名，包括共黨高級軍事與政治領袖，放下武器，走出森林。

無疑的，這是一件震驚東南亞的政治新聞。數百名武裝份子的投誠，使殘餘在森林內的砂共武裝部隊，失去主要的戰鬥力，對砂勝越的和平安全已不再具威脅性。因此首長耶谷即時宣佈，自該日起，砂勝越境內的所有戒嚴區，宣佈解除。

另一方面，在古晉馬當森林潛伏着的另一支砂共武裝部隊，由林和貴及沈友貴率領的砂勝越人民游擊隊，在經過數度談判後，也於較後放下武器，走出森林。此後人民游擊隊

隊員只殘存數十名，由張亞華（曾佩雄）率領，在第一省與印尼邊界流竄。

對於大馬政府來說，斯里阿曼和平行動，不僅節省了大量的軍事費用；而解除了戒嚴的鄉村地區，人民將可以平靜生活，不再因軍警圍剿軍事行動而担驚受怕。實際上，許多鄉村已因長期戒嚴導致生產萎縮，經濟破產，農民不得不離鄉遷往他處。

和談理由

砂共領導人黃紀作曾經表示，戰亂已導致許多華人農村破產，對砂共產生了怨恨，倘若繼續武裝鬥爭，受害的將是廣大的華人農村。另一方面土著也不再支持地下份子，間接與政府合作，更使砂共不易再進行森林裡的鬥爭。

在華人區，逮捕行動頻密展開，羣衆苦不堪言，連生活亦受到打擊。

砂撈越古晉及斯里阿曼省的共產武裝活動起步得較早，受到的打擊也越大，繼葉存厚、楊桂中的部隊受馬、印軍方剷除後，一九七〇年行動，將砂共的秘密軍事基地摧毀，又於七一年三月八日在青山地區展開另一次的大圍剿，砂共死傷慘重，根據地被瓦解。

七三年，政府軍在倫樂、海口、西連及石隆門也加強反擊行動。

在拉讓江流域的東部地區，政府頻密的展開保安行動，也使洪楚廷所領導的部隊疲於奔命。

這一切的不利因素導致砂共處於危急狀態。當然，另一重要因素是黃紀作稍後在第二省受到軍警圍困，難於突圍，而先行有意與政府談判。

政府方面，每年必須撥出巨額軍費進行勦共，一旦砂共有意放下武器，當然求之不得。

首席部長拉曼耶谷在斯里阿曼行動時接受訪談時指出。

政府接受和談建議，乃是因為政府渴求這場衝突的結束。這是政府行動的指南。藉此政府可以竭盡全力，把一切精力與物力用來建設一個嶄新的更美好的砂勝越。

「這便是我（耶谷）得悉黃紀作及他正在從事武裝鬥爭的數百名（其中許多是在殖民地時代便開始）現在有意放下武器並遵守我們憲法而工作之時，便抓緊這和談機會的理由。」

政府攻勢

自砂共展開武裝鬥爭之後，初期政府對付游擊隊的保安措施，是軍事行動的形式，由保安部隊單獨負責，時時展開某些短期性的行動。

砂勝越聯合政府於一九七〇年七月七日成立，這之後政府採取新的策略，發動了無數的民事與心理與軍事運動，把前綫推廣至所有活動範疇，把游擊隊孤獨起來，使游擊隊無能為力。

在保安方面，政府盡可能以俘獲游擊隊員為最大成功。這些投誠者在得到寬大待遇後，對於森林裡的同志更具說服力。

一連串的逮捕行動以及心理戰術，使政府獲得較之軍事行動更大的成功。

斯里阿曼的成功，已被視為世界上第一個政府能成功藉用政治策略來處置一場相當有組織的武裝鬥爭。這個組織除了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短暫的一段對抗時期，曾獲得外

界援助之外，主要皆靠自力更生。一位研究共產組織的權威陶格拉斯·海德氏對砂共有極高評價。然而，斯里阿曼行動下，數百名游擊隊的集體投誠，不能不說是一個異數。

斯里阿曼行動之後，砂撈越共產組織顯然只剩下殘餘的部隊。租後一九七七年地下開始批判黃紀作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認為紀作當年決定所有部隊撤回國內是不正確的作法。

一九七八年遠在北京的文銘權來信予地下組織，認為與黃紀作分裂是正確的，文的信簡單，也未給予新的指示。

砂共組織從五十年初開始成形，六十年代進行武裝鬥爭而壯大，而斯里阿曼行動的結局，即已顯示了砂共已處於式微形態。

砂朥越首席部長與北加里曼丹人民軍 主任兼政委黃紀作簽署之諒解備忘錄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黃紀作氏在一封致首長的私人函件中，表示爲了「恢復本州和平及終止戰爭，以便進行建設與發展」，他及他同僚願意放下武器。該函於一九七三年十月三日收到。在黃氏請求下，首長於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九日，廿日及廿三日，在成邦江政府館跟黃氏舉行會議。在這項會議中，黃紀作氏提議在下述考慮下，他所指揮的北加人民軍各單位願意放下武器，重返社會爲人民服務：

第一部份

（一）北加人民軍隊員的馬來西亞公民地位受到保證，北加人民軍印尼國籍隊員，在申請時給予馬來西亞公民權。

首長解釋在發給公民權方面涉及三類人士，第一類爲那些人士他們是馬來西亞公民。第二類爲那些他們要想成爲馬來西亞公民之印尼國籍人。第三類（如有）由其他外國人士組成。至於那些誠實爲馬來西亞公民，首長保證他們將在馬來西亞憲法下享有公民權利。至於第二類人士，根據黃氏估計大約廿人，首長解釋根據馬來西亞與印度尼西亞兩國政府協議規定，應該把這些人遣送回國。可是首長保證，由於情況改變，將把他們的案情，向印尼政府提出，希望能允許他們留在砂朥越。他們的馬來西亞公民權申請，將在通常情況下按照馬來西亞憲法規定來加以考慮。至於第三類人士，他們的馬來西亞公民權申請，將在適當憲法條文下加以考慮。首長進一步闡明，所有重返社會的人士，將各自受到像看待

任何其他公民或其他居住在砂朥越外國人士同樣的公平的對待。

(二) 北加人民軍隊員獲有機會參與砂朥越聯合政府的管理。

在這項會議中，已向黃氏解釋他們在從事合法活動方面，享有像任何其他馬來西亞公民同樣的權利。黃紀作氏在說明他這項請求時稱，砂朥越聯合政府成員黨在下屆大選中，可以考慮他的一兩名人士作為候選人，至於這一點，首長答覆稱，候選人提名一事完全由有關成員黨來決定。政府不會選擇候選人。他的一兩名人被提名為候選人的可能性，可以由有關政黨來考慮。

(三) 在維護公安法令下受拘留人士，在和平實現及人民利益下，應准他們重返社會。

首長解釋維護公安法令授權有關當局可拘留任何人，如果他在砂朥越的活動威脅到國家安全。政府經常檢討拘留人士案情，實際上，其中許多人已獲得釋放。那些尚被拘留的人士，如果政府認為他們不再對國家安全有所威脅，一定會考慮釋放他們。因此這完全需看拘留人本身去接受國內情況的改變，決定作為效忠與愛好和平的馬來西亞公民而生活。

(四) 管制區將在恢復和平時撤銷。

首長保證在州內和平全面恢復時將顧到情況的改變而對撤銷管制區問題作有利考慮。

(五) 在過去殖民地統治時被遞解出境赴外國的人士，在申請時需答應給他們馬來西亞公民權。

首長解釋了有關這項問題的國際慣例，並保證在馬來西亞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時，將檢討這問題。

(六) 政府考慮北加里曼丹共產黨合法化。

首長解釋在目前的情況下，聯邦政府認為允許任何共產

組織註冊，跟國家利益不符。首長進一步解釋聯邦政府不可能改變這項政策，而且羣衆也不會接受這項政策的改變。首長相信在本國憲法現有體系內，任何人能夠在不損及本國安全情況下進一步貫徹人民的利益。

(七) 他們組織內那些人員如要移居其他國家，應給他們必要的移居許可。

首長肯定這種請求將獲得認可。

第二部份

設立一隊出於自願的先鋒工作隊，以協助政府爲羣衆利益實現政府發展計劃。

首長歡迎這項有建設性建議，並進一步解釋稱，目前州內已設有一個宗旨相似的這種團體。

雙方同意北加共產黨黨員擁有之所有武器彈藥，應在雙方管制下與監督下銷毀。

上述諒解已記錄在案，並於一九七三年十月廿日在成邦江政府館（現已改名爲和平館）達成。

拿督哈志阿都拉曼耶谷
砂朥越首席部長兼行動主任

黃紀作氏
北加人民軍主任兼政委

第十四章

民主浪潮衝激下 共產世界的變革

一九八九年，共產主義世界爆發了驚天動地的變化。它的震撼性不僅影響了共產世界的未來走向，國際形勢亦因之改觀。共產國家廣大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浪潮洶湧澎湃，爲人類政治史上寫下新的篇章。

中國與東歐的共產國家所爆發的民主運動，雖然其結局有所不同，但其偉大意義却是一樣的。中國在四月與五月間發生了波瀾壯闊的爭取民主、法治與人權的運動，要求加速政治與經濟體制的改革，結果遭來一場血腥的鎮壓，這固然是一個悲劇，但它不僅是震撼了共產世界，同時成爲國際注目的焦點。

東歐的波蘭、匈牙利、東德、保加利亞與捷克的改革派，在八九年的民主改革運動中，却是取得輝煌的成果。波蘭是第一個出現非共政府領導的共產國家，匈牙利共產黨則更進一步，自我毀滅，宣佈解散共產黨，換國名，改走西歐式的民主道路。東德也不落人後，在一場示威浪潮中，保守的斯大林主義者的東德共黨黨魁黯然下台，隨後東德共毅然宣

佈開放柏林圍牆，讓人民自由前往西德與西方國家，並且計劃自由選舉。

自由派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曾說過：世界上只見過民主政權被推翻，何曾見過共產政權被推翻？由於八九年東歐國家的大變革，這句話已有修正的必要。

從政治發展史來看，自一九一七年，蘇聯建立了第一個奉行馬克思主義的共產國家以來，從東歐以至亞洲，大半個地球幾已變色。戰後以至七十年代，乃是共產主義運動的興盛期，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之後，亞洲的局面因之改觀，當越共取得越南政權，中南半島赤化之後，「骨牌論」一時流行，東南亞幾有被共產黨吞噬的可能，令自由世界人民為之憂心。

然而，八九年的「國際大氣候」却改寫了人類政治史。從波蘭和匈牙利等東歐國家的事態來看，共產政權並非來自外力所推翻，而是自我質變。實際上，以共產世界的嚴密組織，由外力推翻是不可能的，只有通過內裡自我變革才行得通。

蘇聯對東歐的影響

在東歐，每一個國家的演變，都有其各自的社會因素與客觀條件。但東歐國家却具有一個共同點，即共產黨政權的建立，並非靠本國人戰鬥得來，而是戰後斯大林擴張主義的結果。東歐人民民族主義精神一直抗拒着共產主義的侵犯。

匈牙利的納吉，在其《論共產主義》一書中，事實上就是以強烈的民族主義對共產主義進行新的詮釋。

共產主義國家自我改革在國際層面的第一個「歷史回合」，是由南斯拉夫的鐵托兆其端，對當時佔據統治地位的「斯大林體制」提出批判及改造，由共產主義一元化轉向多元化的改革一九五六年蘇共的二十屆大會，赫魯曉夫更全面掀起了「非斯大林主義化」運動，這一歷史轉捩，對當時共產主義世界產生巨大迴響。但即使在赫魯曉夫統治下的「非斯大林化」時期，納吉於一九五六年匈牙利所掀起的改革，還是遭到鎮壓，並且逃避不了被判處決的命運。

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鞭屍，引發了波蘭的波茲南暴動以及匈牙利的十月革命，但卻遭到坦克鎮壓。

一九八九年的中國民運，基本上是由於鄧小平十年的改革所引發的，結果也是遭到坦克的鎮壓，但兩者却具有不同的國情，前者是由外國人開兵鎮壓——中國的民運却是在本土遭到本國統治者的鎮壓，導致民運份子不得不潛逃國外，組織「民主陣綫」，進行長期的鬥爭。

一九六四至一九八二年，蘇聯在布里茲涅夫統治下，回復到「新斯大林主義」的保守時期，那是共產主義改革運動的黑暗期。隨着戈爾巴喬夫的上台，他所具有的「政治新思維」，開始逐步在蘇聯實行經濟改革，並且放鬆了對東歐的控制，而相繼引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變革。

弊端叢生病因何在？

共產主義社會，為何需要進行一場如此巨大的變革，通

過非暴力的革命，推翻了原有的制度，這是否意味着共產社會已不適應世界潮流，阻礙了政治與經濟的發展。

共產主義，作為人類的理想，經過馬克思歷史唯物觀的包裝，變成了一種具有科學性的理論。一百多年前，當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期那種慘無人道的剝削年代，戰禍頻仍、階級鬥爭強烈，共產主義思想成了世界苦難人民的明燈。馬克思主義從德國誕生，很快席捲歐洲、亞洲以致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以它作為信仰依據，乃是具有其歷史因素。

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給馬克思主義開創了一個從理論到實踐的先例。蘇共建立首個共產主義國家，世人因此更深信馬克思主義的可行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於是成為一種革命鬥爭的指導哲學思想。

經過七十年的實踐，共產主義社會已顯得弊端叢生，政治與經濟體制的不能開闊，束縛了社會的發展。不斷產生的非理性鬥爭，禁錮了民主、自由與人權。一個非理性的社會，它之將遭受到遺棄，乃是可以預料的。

共產主義國家基本上是黨的國家，而無產階級一黨專政已為這個國家命定了它的政治體制。這為打下江山的共產黨人構設了掌權的法理根據。於是，共產國家的政府管治權，以至立法、司法權，都不是公眾所擁有，掌權者具有絕對權力，甚至輿論也操縱在以武力取得政權的統治者手上，而國家乃成為權力私有制。

共產國家的政府只是黨政府，軍隊只是黨的軍隊，通過黨強調意識形態的統一，黨內意識形態一致乃是個人獨裁

的精神基礎。列寧的獨裁已夠兇，而斯大林的極權式獨裁更進一步，毛澤東的權力也一樣建立在獨裁的基礎上。馬克思主義至此受到歪曲，為專政的需要而給予特定的詮釋。

按照共產黨人的想法，社會主義原是資本主義過渡到人類終極目標「共產主義」的轉折階段。由於它是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及文明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就應該在政治、經濟及文化各個層面上比資本主義更發達，更先進，既然是人民當家作主，理應由多數人統治自己的社會。歷史上的剝削階級從此再沒有任何地位。

可是，這終究只是空想的世界。兩年前，波蘭團結工會領袖華爾沙出版自傳。他毫不客氣的提出批評：「所謂社會主義，不過是弄虛作假、謊話連篇，是非顛倒的代名詞。在這個社會中，幹邪胡作非為，人民受苦受難，而最嚴重的是人性被扭曲，人的個性難以發揮、人與人之間無法真誠相處，是一個徹頭徹尾醜陋的世界」。

在更早之前，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之一的吉拉斯在他所著的「新階級」一書中已提過強烈的抨擊。他指出：當代共產主義乃是具有三種基本要素以控制人民的一種極權主義，第一是權力，第二是所有權，第三是意識形態。此三者皆為獨一無二的政黨或——由一個新階級所獨佔。而在目前，則由該黨或該階級的寡頭集團所獨佔。在歷史上，甚至當代歷史上，從未有一種極權制度——共產主義例外——能將這些要素並用，而控制人民到這種程序。

數十年來，無數的共產國家的共黨人揭露了共產主義的

本質，說明了共產主義乃是違反了社會的發展規律。真正反對共產主義者，並非來自非共社會，而是來自於共產社會，這一點，從東歐的社會變革中國的反共民主運動以及中南半島的逃亡潮，說明共產主義的變革是大勢所趨。

馬克思主義的異化

共產主義國家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產生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它是依據當時國際工人運動的歷史經驗作出總結。它的三個組成部份是歷史唯物論、政治經濟學與社會主義學說。通過「資本論」及多種哲學著作，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規律而提出預言：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終至發生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從而誕生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的社會。

然而，事實的發展却不然，列寧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却是發生在落後的農業國家，基本上是一場廣泛的農民革命運動，這即是說，至今尚未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爆發過共產主義革命，反之，則只有落後國家的羣衆革命運動。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異化，為共產主義世界帶來先天的不足。

列寧在一九〇四年斷言「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提出這個論調至今已逾八十年，並未見到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退出歷史舞台，為共產主義所取代。相反的，資本主義國家却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的經濟增長、科技發達、人民生活水準不斷提高。雖然資本主義每隔多年即爆發一場經濟危機，社會諸多弊病，但它終能予以克服。馬列所提出的資本主義消亡論，事實並不然，並未得到

科學的驗證。

共產主義社會最大的危機是一直未能取得經濟成長。由於此等國家所實施中央計劃經濟，未能發揮人力潛能，束縛了經濟成長。一九一八年第二國際領導人考茨基即指出其癥結所在：「共黨雖能奪取政權，但却不能治理國家（見所著「論無產階級專政」）。經過七十年的驗證，這預言似已成爲事實。

共產主義國家之所以在經濟上難獲至成就，這與共產主義政治制度密切關連。

共產主義的歷史觀，其中心點就是說，所有社會超乎原始水平的，都分裂成階級，在從事不停與不能調和的鬥爭：階級鬥爭的教義，對所有共黨關於社會與政治的思想，就以這個概念作爲指導標準。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作出了一個教條的論斷：

「至今存在過的一切社會底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從這一論斷出發，共產主義社會無休止的階級鬥爭導致社會分化，生產萎縮。而強調無產階級專政，無疑是導致共產黨的獨裁地位。

東歐共產國家的變革，乃在於自我更新。這裡產生了兩個問題，即是如何使黨政分開，以及進行體制外的改革。

共產黨本身已成爲現代化過程中的最大的絆腳石，這是歷史的諷刺，長期以來「以黨代政」乃是共產國家的政治特徵。共產黨是執政黨，凌駕於一切機構，結果是權力的集中導致權力的腐化。東歐國家深信只有民主改革國家才有得救

，而試圖改革民主社會主義。這些國家正在進行多項改革的嘗試：

（一）波蘭與匈牙利共產黨都同意「多黨制」，通過自由選舉，由選民裁決誰執政。這種放棄一黨專政，共產黨不再擁有絕對權力，乃是一項大突破。

（二）放棄中央計劃經濟，改革市場經濟，這將使經濟生產具有較大活力。

（三）給予人民自由的權利，東德的開放柏林圍牆，讓人民自由出境，讓人民追求自由的生活。

實際上，經濟的改革不能不進行政治的改革。中國強調「體制內改革」，那是行不通的。政治多元化與民主化乃是經濟多元化的先行步伐。

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

東歐的改革運動，甚至是廢棄共產黨，這與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有極密切關係。倘若不是蘇共領袖戈爾巴喬夫的首肯或默許，東歐的改革定將再度遭到坦克鎮壓。這裡舉出歷史的紀錄。

一九五三年六月，蘇聯出動武裝部隊鎮壓東德人民運動。

一九五六年十月，蘇聯出動武裝部隊鎮壓匈牙利人民起義。

一九六八年八月，蘇聯出動武裝部隊鎮壓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運動。

蘇聯動用武力鎮壓此等國家的民主改革，其理明顯。不

論是斯大林時代，抑或是赫魯曉夫、布里茲涅夫時代，他們都以宗主國的立場對待東歐國家，視東歐國家為附庸國或殖民。布里茲涅夫甚至提出「有限主權論」，即是認為東歐國家只具有有限主權，而蘇聯則君臨這些國家，擁有無限主權。在這種情形下，要求民主自由的東歐人民，怎不遭到武力鎮壓呢？

戈爾巴喬夫掌權之後，他對於東歐國家的民主改革持有不同的看法，他甚至鼓勵改革運動。這一方面固然是國際潮流所趨，但與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更具有密切關係。雖然至今為止，戈氏仍堅持馬列主義，但在實際行動上已越出其前人的死框框。他在「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寫道：

「是應該結束從帝國立場出發看待對外政策的時候了。無論是蘇聯，還是美國都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別人。鎮壓、強迫、收買、摧毀、破壞只能得逞於一時。這只是暫時的。從長遠的政策，即從重大的宏觀政策角度來看，誰都無法使人屈從。」

他在「新的政治思想」更進一步表露：

「當代普遍安全的原則基礎是，承認各國人民有權選擇自己的社會發展道路，不干涉他國內政，尊重其他國家，同時用客觀的和自我批評的眼光看待本國社會。人民即可以選擇資本主義，也可以選擇社會主義。這是他們的主權。各國人民不能而且也不應當受美國或者蘇聯支配。」

在新思維指導下的戈爾巴喬夫，已不再是以「新沙皇」的態度來對待東歐國家的民主改革。從他的政治行為看來，他主張「對話」解決矛盾問題，而不是採取更強硬的手段。當數個蘇維埃加盟共和國爭取更大的自主權時，戈爾巴喬夫以「對話」方式解決了彼此間的矛盾與歧見，這是一個明顯的實例。

波蘭組成非共政府，匈牙利廢除共產黨組織，東德的「自由化」運動，這一切幾乎是摧毀了共產主義世界，倘若是在以往斯大林或布里茲涅夫時代，那是不可想像的。然而這一切都發生在戈爾巴喬夫的時代。毫無疑問，戈氏是一個領導時代前進的革命性人物，他應該受到高度的評價。

今天國際大氣候是共產主義走向沒落，民主、自由與人權為全世界人民所共同追求。東歐共產國家從量變到質變的發展，這是完全合乎社會發展規律的。

結論

一九八七年，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七十週年時，曾經是南斯拉夫共產黨領袖的吉拉斯曾說：共產主義不是正在改變，它正在崩潰。兩年之後，已應驗了這個預言。

東歐的變革，乃是大勢所趨。倘非如此，則此等國家勢將掀起更大的風暴，對國家的破壞力更大。自由化運動不僅合乎社會發展規律，也合乎人性的發展。

這一場八十年代末的變革運動，已改變了世界的結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東西兩大陣營的對抗，現時已出現結構性的變化。

東歐國家最近流行一段話：「共產主義是資本主義走向

資本主義的一段最漫長、最痛苦、最昂貴的道路。]全球性的共產主義變革，已引起新的政治思潮的探索。這世界將何去何從，任何人一時都還不能找到答案。



范國強黃賽鶯 電台廣播呼吁

「北加人民游擊隊的全體指戰員：

我們離開森林，回返社會已經一個多月了。在此之前，我們通過電台先後發表了兩次的聲明，未知你們收聽到與否？今天，我們本着向國家，向人民，向朋友負責的態度，願借此公開信再次向同志們談談幾個問題，望同志們拿到此公開信時，細心地閱讀和思考，但願我們的話能激起你們新的覺醒；但願這些勸告能帶給你們新的力量和勇氣，以便你們去選擇新的生活和新的道路！

同志們，現在就讓我們先來討論目前的“革命形勢”。關於目前的“革命形勢”，你們是如何估計的呢？我們相信你們那裡的領導一定不敢說形勢是一片大好了。他們最多只能安慰你們說「不利的形勢是暫時的，經過“革命黨人”努力，不利的局勢將被打破，順利的局面一定會到來」。但是，根據我們看法，目前這種對砂共不利的局面是大勢所趨，不管你們如何“努力”也是無法挽回的了，你們不需要抱着那不實際的幻想了，為什麼呢？這是因為你們已失去民心，而政府已贏取民心。人民，特別是一省的人民已經普遍對“武裝鬥爭”失去信心。我們可以告訴你們，這幾個月來，第一省的群眾熱烈響應政府的號召，他們陸續不斷地出來向政府自首。還有，一省的地方工作者及其武裝人員，

其中包括幾位高級幹部也紛紛出來自首，他們積極向政府提供有利情報，所以政府對你們情況已是非常清楚。保安部隊隨時都可以有效地向你們發動大規模的軍事圍剿。你們現在其實已經是完全陷入軍隊的包圍圈中。人民已站在政府一邊，他們隨時都來向政府報告你們的行踪，所以你們也已陷入了人民的汪洋大海中！“革命形勢”只有越來越惡化，絕對沒有好轉的希望。過去幾年，由于群眾對“武鬥”實質未看清楚，他們當中的一部份人還會相信砂共的宣傳，同時由于群眾對政府的政策不夠了解，不敢積極向政府自首和提供情報，所以，那時你們能夠爭取了一段有利的時機。然而，今天的情況不同了，我們應該說，過去一時的轟轟烈烈是暫時的，是僥倖取勝的。今天和今後的失利及其失敗，才是最根本的。

同志們，當前的“武裝鬥爭”及“地下組織”還有甚麼值得你們留戀的呢？你們還在那裡等待什麼啊！你們“堅持鬥爭”是爲了誰呢？處在今天的局勢及在那樣的領導底下，你們的鬥爭，已經完全不是，也不能爲人民服務了。你們不過是在爲少數砂共頭子服務罷了！難道你們願意與那不爲人民所支持的鬥爭及不爲人民所承認的領導同歸於盡嗎？我們過去所嚮往和追求的目標——共產主義，未必最美好。事實證明，這個主義不適合於我國這個多元化民族的社會，我們又何必爲此而奮鬥一生！馬來西亞並不是我們過去想像得那樣恐怖。我們出來後，親眼看到的一切新事物，使我們對她有了新的認識，尤其是在聯合政府執政的砂州，我們看到民主制度的許多優越性。人民在民主施政下受惠不

少。馬來西亞的政治、經濟基本上是穩定的，人民的生活基本上也是穩定的，不像我們過去所想像得那般水深火熱。“革命”本應是爲了人民，而不是爲了那空幻的理想和主義，所以，人民需要甚麼，我們就該做甚麼。人民不需要的東西，我們爲什麼要強加給他們呢？人民還不想幹的事情，我們爲甚麼要代替他們去幹呢？我們無論做甚麼事情都要從實際出發，只有符合實際，不是從抽象的空洞的理論出發，才会有現實意義。同志們，如果你們能夠冷靜反省過去的一切，特別是近幾年來的鬥爭，你們一定能發現到我們的鬥爭已經是遠遠脫離群衆來了。我們所要鬥爭和打倒的對象，正以嶄新的面貌，泰然屹立在馬來亞半島及婆羅洲島上；我們所追求和嚮往的革命目標——共產主義，又是多麼得不實際和渺茫！時到今日，我們還有甚麼可以猶疑的呢？提起勇氣，果斷堅決放棄那已失去意義的鬥爭，重返社會，與廣大群衆共同負起那具有真正的現實意義的建國事業，才是明智之舉。

據我們所知，你們當中的很多人都已經失去信心，但是由于你們沒有收聽電台廣播及閱讀報紙的自由，你們對最近的局勢缺乏了解，對政府政策還存有懷疑；更有些人受到人爲的監視，失去行動的自由，這些都是造成你們無法立即走出森林的主因。我們以爲，這是很不合理的，你們的領導有什麼權力剝奪你們的這些自由呢？革命是自願的，就應該大方讓其部下在徹底了解內外形勢的情況下，由他們自己去判斷，去選擇自己的道路，任何勉強都是不應該的。我們希望你們不要繼續當那“愚民政策”的犧牲品，一定要想方法通過群衆了解更多外面的局勢，以便你們自

己能心中有数，適時地作出擺脫地下組織和“武裝鬥爭”的決定

你們當中的有些人，也許還由于一些觀點問題沒有搞清而影响了你們下決心，比方說，怕出來後會被人取笑爲懦夫，怕地下組織指斥自己爲叛徒，而且担心出來後會被地下份子暗算掉。由于這些顧慮，因此雖然已經對鬥爭失去信心，但是仍然提不起勇氣出來。我們認爲，真正的懦夫是那些不敢面對現實，不敢向真理低頭的人，他們因死愛面子而自欺欺人，以致自暴自棄而自取滅亡！只有具有勇氣、有決心、有理智的人，才不願去冒天下之大不韙，才能在關鍵的時刻，果斷地作出明智的決定，勇敢地選擇一條新生的道路。地下組織盡管可以指斥我們背叛他們、背叛共產主義，但是他們能譴責我們背叛人民、背叛國家嗎？不能，當然不能。因爲事實就不是那樣，我們正是抱着向人民負責的態度才要放棄這場已經完全失去意義並毫無勝利希望的鬥爭！站在維護廣大群眾利益的立場，我們這樣做是正確的，是無可非議的。地下組織的領導人敢証明他們是最正確、最能代表人民意旨的嗎？當然不能。既然如此，他們就沒有理由要求我們一定要跟着他們硬幹下去。他們如果真的敢向放棄“武鬥”的人士下毒手，他們將自食惡果。那一個瘋子願去爲他們執行這種卑劣的勾當，他就首先滅亡！

同志們，砂共得勢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希望你們認清時局後就下定決心，拋棄一切思想顧慮，相信政府，相信人民，迅速返回社會吧！

我們見過砂州的首席部長及政治部主任，他們都是很賢明的領袖，他們都非常賞識每一個人的才幹和學識，他們都非常希望盡早結束這場“武鬥”，他們都誠懇地希望地下組織份子能立即放棄敵對立場，返回社會，幫助政府進行社會的和平改革與建設工作。

你們當中很多人都是很有才幹的，我們相信，你們出來後，一定能在和平的環境裡，為人民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歸來吧，同志們，我們熱烈地等待着你們。

范國強（吳鐵）

黃賽鶯（林輝）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六日 』

我的聲明

我，林廣民，現年三十二歲。在中學時期，由於自己年幼，社會經驗少，因而，在學校里的顛覆份子的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下，產生了對共產主義「美麗」幻境的嚮往，終於在1958年被介紹加入砂拉越先進青年會。數年來的生活和經歷，使我逐漸地看清了這個地下共產組織及其一些高級人物的猙獰面目，深刻地認識了共產主義學說的實質——殘酷無人性，它是背叛我國人民的，——破壞我國人民的和平幸福生活，破壞我國的民主制度，破壞我國各民族之間的和諧關係，摧毀我華族有數千年傳統的家庭關係和生活，它是根本不會實現的幻想，因此，我毅然決定放棄和反對共產主義思想及其鬥爭，維護我國傳統的民主制度，宣揚各民族和睦相處，互相忍讓的精神，共同創立和維護反共的、民主的、自由的、繁榮的幸福的馬來西亞！

學校顛覆活動

在參加砂拉越先進青年會之前，我就已被利用，在學校進行顛覆活動，向同學宣傳共產主義思想，宣傳反政府；參加之後，在地下共產組織的指使下，通過組織年幼學生補習功課、旅行、文娛活動等方式，積極向他們灌輸共產主義思想，煽動反政府，有步驟地誘導他們，直至加入地下共產組織，而後利用，指使他們在學校里或準備隨時輸送他們到工會、農村、政黨中去，進行同樣的非法的，顛覆活動。

這些顛覆份子的活動——花言巧語、欺騙性的宣傳，誤

導了年幼的學生，他們荒廢了學業，毀壞了他們的光明前程，使其父母對他們的期望和寄托變為泡影。願做父母的對他們的兒女的學業和活動多加關注，俾使後者不致受邪說誤導，而進入歧途。

地下共產組織的「統一戰綫」

1961年離校後，我就被調往教育界，為貫徹地下共產組織的文化教育政策——共黨推翻民主政府奪取政權的策略之一，而進行顛覆活動，利用華人愛護華文教育的熱心，煽動他們反政府，以遂共黨製造機會奪取政權的陰謀。

之後，我又被調往政界，參加某一政黨內的顛覆滲透活動。時適地下共產組織在該政黨內的高級幹部很多已經或且將會被逮捕，或且欲避免被捕而擬逃亡之際，我才被調往該部門，進行所謂統一戰綫活動，俾使地下共黨組織能夠繼續控制和利用合法政黨，或影響該黨（中央）的政策，利用合法地位鼓動人民反對政府，以便逐步地欺騙和迫使人民走上暴力鬥爭，直至最後奪取政權，建立共黨專政。

地下共產組織的「統一戰綫」，就是共黨份子利用合法團體包括政黨，利用社會上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士——即共產組織所稱的資產階級的某些弱點，拉攏和影響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贊同和執行親共政策或路綫；利用和顛覆合法社會團體，影響和煽動這些團體的成員，進行反對國家，反對政府，反對人民的種種活動，這一切都是為了準備和協助其萬惡的「暴力鬥爭」的展開，以便達致共黨專制的實現。地下共產組織的這種卑鄙惡劣的手段和陰謀活動，已被許多社會名流和人民羣衆所認識，並且定將為越來越多的人們所看透的。

國際活動

1963年初，在砂拉越先進青年會的命令下，我和葉存厚、楊柱中、朱增仁等人越境，到印尼加里曼丹，為獲取

蘇加諾政權的軍事援助，以武裝砂共地下份子及其同情者而進行活動。成批成批的青年男女被恐嚇、欺騙或被令越境後，我們負責和蘇加諾政權協商安頓、訓練、武裝他們，並策劃侵犯我邊境，進行騷擾破壞等違害我各族人民的活動。

1963年底，我們在西加里曼丹會見了汶萊叛變首魁即當時的「北加統一國臨時革命政府」總理阿查哈里，密商建立統一戰綫，圖謀在國內武裝推翻我民主政府，在國外進行「反馬」外交活動。

直至1965年初，我，葉存厚等人在砂共地下組織的授意下，應亞查哈里之邀請飛往椰加達，參加其流亡政府內閣，而我被委為財政秘書。直至1966年中，我們一直在椰加達、亞非國家活動。

1965年4月份，蘇加諾政權在椰加達舉行萬隆會議十週年紀念活動。由阿查哈里率領的，我等人組成的「北加代表團」受邀參加活動，這期間，會見過共產中國總理周恩來，北越總理范文同，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即北韓）首相金日成，印尼總統蘇加諾，外長蘇班德里約，南越民族解放陣綫代表團團長阮文杜及其他亞非國家代表，並各自向他們提出要求軍事援助，但一切徒勞無結果。

1965年5月，我率領「北加代表團」到非洲加納（當時總統恩克魯瑪）出現親共的亞非人民團結組織會議，謀求親共團體的支援，然除「支持武裝叛變」的紙上決議外，一無所得。

出國期間，途經羅馬、加納的亞卡、日內瓦、加拉蚩。

到共產中國，最後回返椰加達。

在我們逗留共產中國期間，爲了顯示共產中國對「北加斗爭」有一點「關懷」和「支持」，其外長陳毅接見了「北加代表團」。

在椰加達活動一年來的期間，和共產中國大使館、北越大使館、北韓大使館、古巴大使館、馬來亞民族解放同盟代表處、南越民族解放陣綫代表處等等，在國際外交活動方面，有着密切的來往和合作。

1966年8月，由于1965年9月30日印共武裝政變失敗，我才返回印尼西加里曼丹邊區，參加武裝恐怖活動，成爲砂拉越人民游擊隊第三支隊負責人之一，直至1968年9月和印尼國民軍駁火中被捕爲止。

地下共產組織的「暴力斗爭」應受譴責

地下共產組織是一個顛武主義的祕密團體。共產份子非常清楚，他們無法在民主的制度下，取得人民的支持和同情，無法通過民主選舉，獲得政權，因此，他們一路來就主張用暴力推翻民主政府，奪取政權。

爲了準備和發動他們的「暴力斗爭」，於1962年底和1963年初，地下共產組織就利用種種方法，誘騙、威脅許多男女青年過境，到印尼西加里曼丹接受當時蘇加諾政權給予的軍事訓練，進行武裝恐怖活動，導致後來在和蘇加諾政權合作下，多次侵犯我國邊境，進襲邊區居民，甚至深入內地騷擾，屠殺無辜居民（如18哩事件）平白造成人財損失。

這就是地下共產組織主張和進行的「暴力斗爭」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其滔天罪行是人民絕不能寬恕的。其暴力斗爭

上應受嚴重譴責和堅決反對。

共黨武裝份子目前正在走向徹底的全面的被消滅，他們所進行的「暴力鬥爭」必然要失敗的，其原因之一是，他們得不到各民族人民的支持，因為共黨的「暴力鬥爭」只會給人民帶來流血，造成財產損失，破壞人民的平靜安適生活，可能導致種族糾紛和互相殘殺。

地下共產組織內部權力鬥爭

砂共地下組織如中共或別國共黨一樣，經常向其成員和人民宣稱它是「為人民利益奮鬥」的組織，但是事實却相反。其高層頭頭，活似特權人物，不僅生活享受，而且各自掌握一定權力，和實力。這些人為了爭奪權力，鞏固個人的統治地位，不斷地在其組織內拉攏親信，樹立個人勢力，同時不擇手段，攻擊孤立其對手；尤甚者，在邊境，他們僅為此，各自鼓勵武裝份子反對其對手，互相公開攻擊，甚至各自率隊倒戈，相互敵視，或相互殘殺。

因此，砂共地下組織及其高層人物的猙獰的真面目，就此暴露無遺了。

特權人物、普通成員

1963年初，砂共地下組織通過種種方法、欺騙、威脅青年男女（其成員或非成員）過境受訓，準備進行武裝叛亂，妄想實現這些特權人物——即他們的頭頭的夢寐以求的野心圖謀——共黨專政也即是這些特權人物的專政。

這些普通青年男女，過境後，在西加里曼丹集居在一起，衣服襤褸，赤腳胼胝，一日三餐稀粥，個個臉黃飢瘦。還有不少的男女，散居到農家去，整日從事農作，辛辛苦苦賺得的幾分錢，還得奉上給那些高高在上的特權人物。當時，

他們的這種乞丐似的生活，真叫人心酸！

至於那些特權人物，他們都過着富翁式的舒服生活。衣著華麗，一日三餐白米飯，餐餐豬腳、肉、魚、人參、罐頭食品，平時還飲食來自或從本地寄來的米祿，阿華田，牛奶，吃得個個肥頭肥腦。

有些自稱「工人階級出身」的特權人物——可謂幹部，還憑藉他們在該地下組織內的身份地位，隨意戲弄異性，導致她們懷孕育兒。被玩弄的女青年，在遙遠的異鄉，遠離親屬，呼爹喊娘無人應，欲逃又無路，只好忍氣吞聲，暗中哭泣，過着暗無天日的日子。

此外，這些特權人物平日還作威作福，普通成員和「幹部」時常挨打挨罵，簡直被視為奴隸。

他們在邊區的武裝恐怖活動，得不到邊區達雅族的支持。糧食斷絕，醫藥缺乏，衣服破爛不堪，個個男女成員餓得只剩一層皮包骨，百病纏身，四肢無力，甚至面形都變了樣。這些武裝份子，投誠的已出來，被捕的已被捕，餓死的餘死，病死的病死。尚存的已寥寥無幾，只等待死神的召喚吧了。

在這種時期里，那些特權人物却私有米吃，有鹽吃，時常還獲得肉類食物添補。所謂人民的游擊隊時常四出搶劫達雅族的木炭、甘蔗、偷殺他們的豬，殺害羣衆，幹出種種不法的，損害人民的行徑。

口口聲聲自稱為「人民利益」及「共產主義者」竟然在他們之間分成特權人物和奴隸，對待羣衆，却如同武裝匪徒。

此外，在後期，由於印尼國民軍圍剿的緊，糧食斷絕，

他們甚至殺害自己的「同黨」，取肉裹腹充飢，殘酷之極，令人毛孔悚然！

馬來西亞華人處境頗好

旅居在國外的數年間，也到過一些砂共地下組織稱之為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先進國家，也旅遊過它所推崇的共產國家——共產中國。所見所聞，使我深深地認識到、體會到，我國華人和其他各族人民，正如那些先進國家的人民一樣，享有真正的自由民主，享有個人財產的權利保障，享有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自由，但在共產國家里，人民却喪失了這一切。

和其他各族人民一樣，我國華人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法律保障，享有同等的參政的權利，享有同等的受教育和就業機會，享有同等的發展我國經濟的權利和機會。……這是有目共睹的。

互相容忍、團結合作

我國是多民族的國家，各民族有着其不同的語言文化，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唯有倡導互相容忍，團結合作的精神，相互促使相互諒解，建立和維持民族和諧關係，各族人民才能過着和平的安寧的生活。

地下共產組織的「暴力鬥爭」和「恐怖行動」，只會給各族人民帶來流血，只會挑起民族糾紛，只會破壞人民的財富和國家的經濟建設。我們各族人民應堅決反對它。

各民族人民只有互相團結合作，同心合力，發展我國的經濟，維護我國的民主制度，才能將我國——馬來西亞建成，強大的繁榮的國家。

呼 吁

最後，我要在此呼吁那些尚在邊區活動的少數武裝共產份子，迅速放下武器，歸來投誠，呼吁那些尚受誤導的，尚在進行顛覆活動的親共份子，勇敢地擺脫共黨的束縛和欺騙，早日出來，俾能早日重返家園，與你們的父母兄弟姐妹歡聚一堂，共敘天倫之樂。

林廣民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

砂撈越先進青年會規章

第一章：總則

第一節

砂撈越先進青年會為一個由革命份子所組成的組織。它為實現砂撈越的自由與民主而奮鬥。所有成員必須努力學習與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以及毛澤東思想來教育群眾及確實地提高政治與思想水平，與羣眾共同成為無產階級的一份子。

第二章 會員

第二節

任何人未被嫌疑為敵人工作的叛徒，有清白的歷史背景，單純的社會關係，良好的品德，及有決心堅守崗位以服務勞苦大眾，能遵守本會規章服從決策，參與實際工作，都可成為本會的會員。

第三節

任何人欲申請成為本會會員，必須有本會成員之推荐。申請人經過小組之決定及較高的有關單位批准後，才能正式被接受為會員。

第四節

本會會員的職責如下：

- ①努力學習，確實地參與工作。
- ②嚴格遵守本會紀律，對抗一切不利革命的因素。
- ③確實參與組織的日常事務，無條件地執行組織的所有

決議。

④向羣衆宣傳組織之政策，並向組織反映羣衆的意見及需求。

⑤使自己成爲羣衆跟隨的好榜樣，與羣衆保持良好的關係。

第五節

本會成員的權利：

①有選舉與被選舉權。

②按照合理的程序，參與本組織工作上的討論。當提呈方案、批評或投訴時可以越級。

③組織面對難解的問題，應提呈解決的方法及可能的協助。

第六節

任何成員申請辭職必須經過小組及高層的批准。任何成員，在四個月內無法參與組織工作及提供適當的理由，組織將予以開除。

第三章：組織

第七節

本組織根據民主中央集權利制度組成。採取少數服從多數、基層服從高層、個人服從集體、支部服從中央之原則。

第八節

本會組織結構如下：

①三個或更多的會員可成立一個小組。

②基於實際需要，數個小組可成立一個支部。

③基於實際需要，數個支部可成立一個縣委會。

④基於實際需要，數個縣委會可成立一個區委會或市委會。

⑤基於實際的情況，數個區或市委會可設立一個省委會。

⑥基於實際的情況，數個省委會可設立一個中央委員會

⑦所有委員會設有主席、副主席、秘書、宣教、財政各一人，以執行本會之會務。基於實際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可以增加或減少上述職位。

第四章：紀律

第九節

本會會員必須遵守與服從下列之紀律：

①不可對抗或遭塌人民及羣衆的利益。

②絕對維護與支持組織的利益及無條件地執行組織的決策。

③服從與遵守本會規章及履行本會會員的職責。

④嚴格服從與遵守一切秘密，對抗一切不利秘密組織的環境因素。

第十節

任何會員被發現不遵守紀律將被懲罰，包括開除，但他可向最高當局上訴。

第五章 輔助章程

第十一節

鑑於本組織目前所進行的地下工作，除了小組會議外，其他會議暫不召開。基於需要時，及按照本會章程，中央委員會可以召開會議。

第十二節

本會中央委員會有權對本章程作詮釋和解釋。

(小心保管)

(此章程譯自政府白皮書「內在的危機」)



後記

砂朥越共產主義運動，曾經對砂朥越的政治與社會帶來極大的震盪。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二年乃是砂共勢力興盛期，它的武裝活動達致高潮。然而，一九七四年初的斯里阿曼和平談判，近六百名共產份子放下武器，走出森林，導致共產武裝力量趨於式微。雖然七四年之後仍有百多名共產成員在森林中活動，但它已難成氣候。

斯里阿曼的和平談判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乃屬首次，它曾引起政治研究者深切注意與興趣。

一九七八年^八杪，筆者重返香港，計劃再度進行學術研究工作。其時寒山碧兄正好出版一份月刊「東西方」，這本雜誌以政治評論為主，在受邀之下，筆者開始陸續寫本書的大部份。只有最後一篇「共產主義世界的變革」，乃是八九年杪所寫。

一九八九年，乃是共產世界重大變革的一年。馬來亞共產黨數千名武裝人員，也於九〇年初走出森林，相信它對現時尚存留在森林中的四十多名砂共武裝份子極大的衝激。

本書在寫作過程中，諸多友人提供資料，出版時蒙數位友人贊助，科學工藝暨環境部長拿督阿瑪揚國斯律師惠賜序文，在此一併致謝。

九〇年九月